

在形式上又是“中国的一部分”。¹

4. 日、英因素

根据本文的研究，外蒙古二次独立前后，日、英两国对外蒙古政治形势的演变颇为关注。其时，日本政府透过由其扶持的代理人，高举泛蒙古主义运动的旗帜，一方面是为了将旧俄在中国东三省的权益尽数收归己有；另一方面则是趁外蒙古局势混沌之时，将自身的国家利益扩张至外蒙古。然而，就其结果来看，尽管日本试图在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中有所作为，但收效聊胜于无。

英国人对外蒙古“二次独立”事件的关注缘起，大体而言，并非基于对外蒙古地缘利益本身的考量，而是出于维护对英国人来说极为重要的战略边疆——西藏的独占性地缘政治利益的要求。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诉求，台克满外蒙古之行的考察重点，乃是将外蒙古问题与西藏问题进行关联性想象，预判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是否可能对西藏当局采取类似外蒙古地区的行动。透过英国因素，我们应当认识到，边疆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性的问题，它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深入认知涉外的边疆问题，还需从世界史的视角予以观察。

数年以后，英国人如此评价 1924 年后外蒙古的政治地位：在外蒙古，由于苏联的政治宣传和军事干预，中国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了，人们一般已经认识到，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纯粹是一种姿态，这实际上并不意味着苏联将要放松控制外蒙古的意图。

【论 文】

现代性与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²

——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研究

黄 莹¹

¹ (俄) E·A·别洛夫、C·Г·卢加宁著，陈春华译：《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蒙古问题的论点》，《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 年，第 357 页。

² 本文为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蒙古语言文化方向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 年）。



摘要: S. 巴达姆哈坦 (С.Бадамхатан, 1934-1998 年) 是蒙古国著名民族学家, 为蒙古国现代民族学的学科独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借鉴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 将真正民族学学科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引入了蒙古游牧社会的研究范畴, 其民族志代表作《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开启了蒙古国民族学田野研究的先河, 成为蒙古国民族志研究与书写的典范。在民族学理论方面, 他在蒙古国的语境下对民族学进行了准确的学科定位, 并对蒙古国境内主体和少数民族群的起源问题、民族形成问题、民族关系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 通过自己的学术劳动, 对蒙古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命题进行论证, 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学术层面的历史性建构。本文在掌握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和总结。重点通过对《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这部民族志研究著作进行解读, 分析 S. 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志写作中对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贡献, 进而发掘其民族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对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理论贡献的探讨中, 笔者从他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对喀尔喀部族形成的论证、对蒙古国新型民族关系的分析入手, 提出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学术上完成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关键词: 民族志 民族学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思想 现代性 民族国家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概况

(一) 选题意义

S. 巴达姆哈坦 (С. Бадамхатан, 1934-1998 年) 是蒙古国著名的民族学家, 他为蒙古国现代民族学的独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蒙古国境内各民族的族源历史、游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家庭、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 他曾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并加以研究, 全面把握了蒙古国这一社会实体的丰富面貌。

20 世纪中期, 民族学在蒙古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兴起, 作为蒙古国第一批民族学家, S. 巴达姆哈坦在借鉴西方学者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 将田野调查引入了蒙古游牧社会的研究范畴, 他的民族志代表专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开创了蒙古国民族学实地考查的先例, 成为蒙古国民族志书写的典范。他所描述的民族志, 运用了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调查和研究方法, 向我们展现的不仅是蒙古民族传统生活为背景的小部落, 而是游牧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他从民族学的整体理论高度对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社会变革做了详尽描述和科学评价。

在民族学理论研究方面, S. 巴达姆哈坦首次在蒙古语语境下规范了民族学的术语表达。他的研究著述, 反映了一个民族学家对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和把握。他将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从对历史学的反思和补充, 转向对现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变革的关注, 使民族学从历史学研究领域脱离出来。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长期调查工作中, 他以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部族的调查研究为基础, 将一些部族模糊的族源问题加以考证, 完成了众多氏族部族地区文化、身份划分等界定工作。他明确提出喀尔喀蒙古人是蒙古民族的主体, 喀尔喀文化是蒙古民族文化的集合。他所领导的《蒙古国民族志》三卷本等学术著作编纂工作, 对确立现代背景下蒙古国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关系、建构蒙古国境内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蒙古国国内外学者对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地位给予了肯定, 对他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借鉴, 但对于这样一位在蒙古国享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族学家, 其民族学思想研究还存在

¹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蒙古研究项目负责人。

比较广阔的拓宽空间。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思想、理论研究、方法实践等方面进行初步梳理和总结，进而探寻在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蒙古国民族学如何书写游牧文明、如何构建国家形象、如何促进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独特过程。同时希望本文能够为我国国内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蒙古国民族学的崭新视角。

（二）研究概况

蒙古国学者 A. 敖其尔明确指出：“哈坦先生对蒙古国民族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已经到了对他的学术遗珍进行研究整理的时候，并且应该对他的自传、生平进行研究。”A. 敖其尔《S. 巴达姆哈坦及其家族研究》专题论文（2004）中，通过对 S. 巴达姆哈坦家谱和《蒙古秘史》的研究论证，考证了他来自黄金家族的事实，但未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评析。G. 策仁汗达、D. 策旺道尔基、L. 毕力格图、O. 普列布等学者或是对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生涯撰写了概念性文章，或是对他的某项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做了纪念性评议，在蒙古国迄今为止还未曾有人对 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做出全面深入地探讨。

在国际上，S. 巴达姆哈坦的一部分著作已经被俄、法、日、英等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受到了东西方学者的关注。然而人们在认识和接受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成果时，大多数是将他的研究成果作为定论加以引用，关于他的学术思想的专门研究至今还是空白。

在我国，蒙古学界的民族学人类学家，虽然对他的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却没有将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同时对他的接受也仅限于直接引用而未加以分析；而在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中，他的学术思想更是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节 研究方法 with 资源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 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其中包括：对民族学基本知识的掌握、对相关学术流派演进的梳理、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分析和民族志写作的析理，以及族群理论和现代性有关理论的借鉴。

1.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差异

人类学（Anthropology/Хүн судлал）和民族学（Ethnology/Угсаатны зүй）都是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学科。一般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问，其中包括四个分支学科：生物或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生物或体质人类学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关联，而后三者侧重于人文社会学科分类的文化主旨，狭义研究则仅指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然而由于学术研究的传统不同，学科发展存在着关联性和复杂性，如果进行“粗线条的划分，人类学具有英美传统，民族学具有德法俄传统。”尽管如此，“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仍是相通的，学术研究的多元领域叠压与趋同也相当明显，当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也在名称上对人类学与民族学加以并称，以调节那些或多或少的看法上的差别。”

蒙古国的民族学继承了带有欧陆传统的前苏联民族学学科特点，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研究，将民族学与人类学加以区别，主要围绕民族工作的任务开展对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和部族的研究，对族源考证、民族识别、族群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关注，蒙古语语境中的“人类学”一词，则偏重于“体质人类学”，注重生物学意义上对人的研究与测量。因此，本文中讨论的蒙古国民族学是受欧洲民族学传统（主要为俄苏学派）的理论影响，在蒙古国逐渐本土化的民族学。

2. 人类学、民族学的相关理论梳理

人类学民族学在 19 世纪中期才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虽然它的产生和兴起与发现新大陆、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但是二战以后，“随着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的挞伐，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也经历了反省和转型的变化。”本文在解读 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时，首先是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史进行梳理，了解和认识其理论的推进过程（从古典进化派到传播学派、社会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具体主义学派、结

构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理论发展进入反思与重构阶段,“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更加开阔,对现代社会的变迁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使这些学科的现实性显著增强。”本文试运用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来评析 S.巴达姆哈坦作为学科带头人所领导的蒙古国民族学研究。同时我们也应注意,这些理论在形成和发展中都是相互依赖和补充的,在使用时应该结合观察,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3. 田野工作 (field work/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 与民族志 (ethnography/этнoгpафи) 的分析

“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¹ S.巴达姆哈坦将田野调查的方法引入蒙古国民族学,奠定了蒙古国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在他的学术活动中,以1959-1962年赴蒙古国库斯古勒省森林地区进行的调查活动最为重要。通过四年的长期考察与深度访谈,他撰写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以及多篇研究著作。本文以 S.巴达姆哈坦所描述的典型民族志为文本,结合他本人的相关理论研究著述,分析 S.巴达姆哈坦如何将西方的民族学经验进行本土化、规范化的过程。另外,重点以克利福德·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理论为依据,将他对文化“最深刻的解释”(即被研究对象自我讲述的理解)在文中加以展现,深入探讨 S.巴达姆哈坦对游牧文明命运变迁,以及现代社会变革等问题的关注。

4. 跨文化比较:与中国民族学经验的比较

在从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史入手进行探讨的同时,将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与蒙古国的情况相比较,对 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研究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中国的民族学最初由西方传入,20世纪三十年代初,田野调查与实地研究工作在全国蓬勃开展,建国以后“在前苏联的影响下,多数人主张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民族学的对象是民族。”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民族学家又掀起了对民族学人类学反思的热潮。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研究中,也是中国民族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蒙古国境内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S.巴达姆哈坦通过多篇论著,反映出他的民族学研究思想从未脱离对蒙古国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从未放弃为繁荣民族文化做出的贡献。关于 S.巴达姆哈坦总体学术思想的把握,可以借鉴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费老的文章中涉及了民族“多元起源”、“凝聚核心”、“多元交融和汇集”等问题,提出了“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等观点,这对我们的思考和研究都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然而仍需注意,在进行比较借鉴时,也不可一味类比,忽视中国民族学与蒙古国民族学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另外,因 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研究涉及到中蒙俄三国边境历史问题,在此将参考我国连续史地研究相关资料,以补充 S.巴达姆哈坦在论述中的不足。

5. 全球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现代性的思考

S.巴达姆哈坦的学术论著,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以来蒙古国境内民族、部族的研究范围,他将学术研究置于工业资本主义、区域不平等、阶级冲突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来唤醒民族情感与理想,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中,铸就了现代化的蒙古国家和新的民族概念。因此我们应该把他的作品与民族解放运动、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二) 资料来源

本文写作的资料来源主要有:S.巴达姆哈坦学术著作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¹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编,《写文化》,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一版,第1页。



（“Хөвсгөлийн Дархад Ястан”）（УБ, 2002）、《S.巴达姆坦论著集》第二卷（“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Бүтээлүүд II”）（УБ, 2004）、《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Бүтээлүүд III”）（УБ, 2005），以及 В. 巴达姆奥云（S. 巴达姆哈坦的女儿，蒙古国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研究员）所提供的相关出版著作、刊物、相片等珍贵资料。

第一章 解读民族志经典著作《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¹》

第一节 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生平

蒙古国民族学家 S. 巴达姆哈坦于 1952-1957 年留学前苏联，在莫斯科大学师从前苏联著名民族学家 С. А. 托卡列夫（С. А. Токарев）²学习民族学。回国后，他就职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并于 1959—1962 年在蒙古国库斯古勒省先后进行了长达 4 年的田野调查，完成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这部专著，并以此获得了莫斯科大学民族学副博士学位。他在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工作了 38 年，为蒙古国现代民族学的学科独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蒙古国第一代民族学家，S. 巴达姆哈坦在借鉴东西方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将真正民族学学科意义上的现代田野调查引入了蒙古游牧社会的研究范畴，其民族志代表作《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开启了蒙古国民族学实地考察的先例，成为蒙古国民族志研究与书写的典范。在民族学理论方面，他首先在蒙古语语境下规范了民族学的术语表达，将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从对历史学的反思和补充，转向对现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变革的关注，使民族学从依附于历史学研究转向独立的学科领域。为了明确蒙古国民族构成问题，他用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将蒙古国众多民族部族的族源、文化，利用口头文学、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的结果相结合，不但比较准确地考证了族源模糊的达尔扈特、驯鹿人、和屯人之来源，同时也描绘了蒙古国众多民族部族在近代 200 年间的社会组织、生活情况、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变迁。1985-1991 年，S. 巴达姆哈坦先生主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蒙日联合“三河计划”课题，旨在寻找 10-15 世纪三河流域蒙古人的起源、历史、文化，明确了孛儿只斤、泰赤兀等其他部族的地域，并开展了寻找成吉思汗之墓的考察计划。这次考察从历史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对蒙古国境内的 25 座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完善了田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依据。1990 年，S. 巴达姆哈坦所著的《驯鹿人民生活概述》（1962）、《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1965）、《孛儿只斤喀尔喀》（1972）、《孛儿只斤宴会习俗》（1973）分别在日本、法国、英国出版，其他论文也分别在俄罗斯、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出版发行。³总体来说，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研究事业，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学的产生、发展，成为历史学科的独立分支做出了宝贵贡献。蒙古国学者称其为“蒙古现代民族学奠基人”。⁴

第二节 解读蒙古国民族志经典《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S. 巴达姆哈坦的早期著作《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是蒙古国民族志经典著作。作者在

¹ 笔者暂将 ястан 译为部族，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完全不同的多层次内涵，多层次在这里包括族源、血缘、文化、宗教等，随着边界在改变，族称也在发生着改变。

²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托卡列夫是前苏联民族学，家、历史学博士、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代表著作有《前苏联各民族的民族志》、《十七-十八世纪雅库特人的社会制度》、《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宗教的早期形式及其发展》、《俄国民族学史》、《外国民族学史》、《民族学源流》等。

³ G. 策仁汗达（Г·Цэрэнханд）：《S. 巴达姆哈坦是蒙古民族学奠基人》，《民族学研究》，乌兰巴托，2004 年，第 9-10 页。

⁴ G. 策仁汗达（Г·Цэрэнханд）：《S. 巴达姆哈坦是蒙古民族学奠基人》，А·奥其尔（А·Очир）著：《哈坦先生是民族学创始人》，分别载于《民族学研究》，乌兰巴托，2004 年，第 6 页、第 170 页。М·Гонболд 著：《S. 巴达姆哈坦的生平与学术活动》，载于《史纲》，乌兰巴托，2006 年。第 20 页。



蒙古国库斯古勒省达尔扈特部族¹进行了长达4年的田野调查，前14个月，他作为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小组成员，对500人进行了34种问卷调查。他长年累月地生活在当地人中间，像他们一样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并用他们的方言交谈，从最稳妥的渠道收集资料——亲自参与观察并记录他们的口头讲述。这本著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几乎收录了达尔扈特部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设计调查计划时，每一年都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工作纲要，积累了大量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材料，用民族志考察的方法考证了达尔扈特部族的族源问题，记述了当地的经济形式、社会变革、家庭关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并进行了详细描述和研究。蒙古国民族学家G·策仁汗达认为，“S. 巴达姆哈坦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为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²“他的思想，得到了蒙古国历史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界的肯定。”³他关于达尔扈特部族和驯鹿人的专著，于1994年被授予国家奖。⁴

《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一书全面体现了S.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志书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从田野作业到民族志写作，一位民族学家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描述，而且还要在其所记录的现象中发现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这才是一部合格的民族志研究成果。1958年，S. 巴达姆哈坦在《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中指出，蒙古国的民族志研究有两个基本方向：“1、研究我国境内民族部族的现代生活，进而认识过去的社会制度结构以及生产生活状况；2、研究近现代以来在人民群众中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民族部族的融合，特别对社会主义民族起源形成过程、具有社会主义主题和民族特征的文化形成原因进行研究。”⁵该著作所记录的文化现象包括达尔扈特部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如：达尔扈特部族的近现代史、氏族和地名来源、经济情况、居住模式、饮食、服饰、社会结构、家庭关系、民间知识、艺术、宗教信仰等，以达尔扈特部族的历史渊源为内在联系，绘制了达尔扈特部族加入民族部族融合、改变游牧生活方式的进程。笔者拟从S.巴达姆哈坦的学术思想来源入手，进而分析他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这本著作中，对民族学理论的构建以及对民族志写作方法的探寻。

（一）《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写作思想来源

“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和演变决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其所以如此的缘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受到整个时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其他相近学科的学术思想发展有关，如果把民族学从整个社会总体中分离开来，我们所能见到的就只是琐碎的史料的堆积或支离破碎的片断。”¹S. 巴达姆哈坦对《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的思路和观点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留学前苏联的学术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二、20世纪五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对学术的需要。他在中学时代曾受到柯兹洛夫（Киселев）、呼·普日来（Х.Пэрлээ）两位考古学家的启蒙，后来在前苏联罗蒙诺索夫大学、莫斯科大学留学时，师从苏联著名民族学家托卡列夫走上了民族学研究之路。

关于民族学的定义和学科定位，各国专家持有不同看法。S. 巴达姆哈坦的学术思想也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经过了几个阶段。因此笔者不主张将其学术思想与某一学派完全对应，而需要结合蒙古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来分析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

¹ 在库斯古勒省的调查集中于乌兰-乌拉、林钦勒浑贝、巴彦珠尔赫、汗赫苏木，在西北部与前苏联联邦国图瓦、布里亚特自治联邦国家接壤，东部与库斯古勒湖毗邻。

² G·策仁汗达（Г·Цэрэнханд）：《S. 巴达姆哈坦是蒙古民族学奠基人》，《民族学研究》，乌兰巴托，2004年，第6页。

³ M. 贡包勒德著（М.Гонболд）：《S. 巴达姆哈坦的生平与学术活动》，载于《史纲》，乌兰巴托，2006年，第18页。

⁴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өрийн соёрхол” M. 贡包勒德著：《S. 巴达姆哈坦的生平与学术活动》，载于《史纲》，乌兰巴托，2006年，第18页。

⁵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页。



特部族》这部民族志的调查和研究思路，具有以下特征：

一、注重对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

蒙古国民族学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发展，继承了带有欧陆传统的前苏联民族学的学科特点，蒙古国民族学侧重于对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部族的族源考证问题，而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起，这几乎成了前苏联民族学的中心课题。19 世纪，沙俄为了稳定国内外局势，开始了对国外民族的研究，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民族学发展方向有所转变，为巩固国内革命的胜利果实，要求民族学者重视对苏联境内各民族的调查研究，各民族也要求了解本民族的历史真相，这种需要促进了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1957-1978 年间，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强调“民族一体化”和加强对世界民族的研究。这一指导思想深深影响了蒙古国民族学的发展，在蒙古境内进行考察的蒙苏联合考古队，以及蒙古国民族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做了大量野外考察和资料积累，对民族起源的最初阶段和居住在蒙古境内的居民文化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论证，都对解决民族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族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人们喜欢用民族学的理论分析历史问题。从民族学本身的学科结构来讲，民族史研究也应该成为其一部分。S. 巴达姆哈坦从丰富的史籍中搜集出大量资料，对蒙古国众多民族部族的起源、精神文化、经济生产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做出了进一步或新的解释，这是蒙古国民族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他在自己的论著中从性质上区分了社会主义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他在原文中称其为“资产阶级民族学”），在他看来，民族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世界上众多民族的文化类型、经济类型，他们的起源、历史分布、相互联系等，民族学的基本材料是人民”。²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民族学能够帮助人民了解真实的历史，能够填补和修正史料记载中的不足和错误，民族学对历史学是必不可少的。他曾提出：“对历史学著作的创作，需要民族学材料。民族学不仅与国家、人民的历史研究相关，同时也具有在民间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对其积极影响、进行讲解的任务。因为民族学能够很好地反映民众的落后思想、信仰和社会道德的起源、恶劣的影响，所以我国民族学的大力发展在对历史学研究的促进方面是不容置疑的。”³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他针对民族学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提出“我国的民族学是最年轻的学科，因此首先明确少数民族地区、分界、历史分布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研究保留至今的原始风俗习惯、起源、现代依然流传的原因，为人们做出解释说明，帮助他们远离旧俗，传播社会主义新风貌，是我们的近期目标。”⁴

三、民族学与人类学相结合

在蒙古语语境中，民族志称作“Угсаатны зүй”，民族学称作“Угсаатны судлал”，民族志对应现代学术概念中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倾向于理论研究，但是人类学称为“Хүн судлал”，S. 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研究将民族学和人类学清晰地区别开来，他所使用的“人类学”（хүн судлал），多指体质人类学。在苏联民族学理论中，将人类学视为民族学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Ю.В. 勃罗姆列伊在《民族学是关于民族的科学》中写到：“人类学新方法的运用，对于解决族源问题做出了更大的贡献。”⁵1958 年，蒙古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同组织田野调查组对前杭爱

¹ 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一版，第 15 页。

²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3 页。

³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4 页。

⁴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4 页。

⁵ [苏] Ю.В. 勃列姆列伊著，汤正方译：《民族学是关于民族的科学》，载于《世界民族》，1980 年第 2 期，第 24 页。



省 400 余人进行了体质人类学测量工作。在总结报告中，S. 巴达姆哈坦提道：“这次测量工作的主要宗旨是：清楚喀尔喀部族的体貌身材，平均身高，头部平均尺寸，眼睛色素，毛发，肤色等。同时人类学调查也要了解人的血型，女性几岁月经初潮，几岁停经，蒙古人的青色胎记问题。”在报告中，他特别提出血型测量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民族喀尔喀意义不大，而对于“几百年来分散独立居住的部落中间（例如和屯人、驯鹿人等）进行血型测量，能够确定氏族间的联系等问题。”并且他肯定了应该在中亚地区追溯蒙古人起源的观点，认为是“科学研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¹。

四、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

蒙古人民革命前，外蒙古地区没有自己的工业、农业、贸易，政权操纵在世俗封建主和寺院封建主的手中，处于政教合一的局面。1921 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政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在前苏联的协助下，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主失去了所有土地和草场的特权，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和牧奴制度。这时期的中央人民合作社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也迅速扩大，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独立起了重要作用。20 世纪三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工业建设，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使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20 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蒙古的农牧业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使个体经济全部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蒙古国民经济中完全占有统治地位。20 世纪六十年代后，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S. 巴达姆哈坦完成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一书。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参照。20 世纪四十年代末，苏联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超速的进步是大家熟知的事实。蒙古国内许多著名学者将计划经济看作苏联取得建设成就的核心所在，建国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工业、贸易迅速发展，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求，改变了从前落后的状态。结合中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情，我们知道全方面地学习苏联，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必然，前苏联是把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典型，把各族群看作具有政治意义的整体，通过“民族识别”确定民族成员身份，为各民族划定一定领域并制定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对象的各种政策优惠²。源自苏联的斯大林民族理论虽然影响了蒙古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但 S. 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学研究中始终根植于蒙古的土壤之上，他用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认识达尔扈特部族——这一处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疆的族群，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当地，乃至蒙古国境内各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的理论建构

S. 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学研究中，完善了将蒙古氏族起源、物质和精神文化作为完整集合体的研究模式，他的学术研究使蒙古国民族学有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发展方向。概括来说，他的民族学理论建构主要包括：对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对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相互影响研究、对游牧文明传统独特性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社集体化的研究，以及对达尔扈特地区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研究等。“如果说在过去的时间内，历史科学以研究重要文献、历史事件为对象，那么在当今时期，我国人民历史各个方面，或者说构造他们几千年来创造的文化遗产的物质文明早期研究，是民族志研究的新领域。民族志是研究人民物质、精神文明史，进而研究其起源、历史分布、居住习惯、血缘关系发展等问题。”³

1. 对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

¹ S. 巴达姆哈坦：《1958 年所做的人类学调查工作》，1959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17 页。

²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第 18 页。

³ S. 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1962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42 页。



由于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在东亚乃至世界历史中所产生的影响，蒙古民族的起源问题较早时期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1930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出版的两卷本蒙古史着重考察了蒙古人的祖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蒙古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在野外考察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论证蒙古民族起源问题的著作。其中，S. 巴达姆哈坦的《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分析研究了关于达尔扈特人起源的种种假设，记录了与他们迁徙和起源有联系的传说，他们的民族名称，最后得出了达尔扈特部族组成包括了萨莫耶德、突厥、氐族氏族的结论。他认为：“最近三年，历史所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驯鹿人中间开展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从结果来看，搜集了大量包含达尔扈特族源、血统、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资料。外国学者称达尔扈特部族是蒙古化的图瓦人，但近几年开始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达尔扈特人是蒙古化的图瓦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¹

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他将达尔扈特地区的研究史料与图瓦考古资料相结合，力求对达尔扈特部族的源头做出解释。需要指出的是，在田野工作中，由于缺乏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调查资料，S. 巴达姆哈坦在搜集当地资料的基础上，依靠了前苏联学者在图瓦自治共和国所做的关于突厥、吉尔吉斯、契丹研究中的人类学材料，并通过苏联学者的翻译间接利用了中文文献。S. 巴达姆哈坦认为：“自古以来，达尔扈特部族的范围与图瓦东部地区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的命运。人民革命以后，图瓦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达尔扈特与图瓦之间形成了边界。因此在图瓦的托金苏木以及其他地区进行考古研究所得到的突厥、吉尔吉斯、契丹时期的出土文物，是与我国达尔扈特地区同期墓葬出土，这些文化依然保留在达尔扈特人的生活中。”²

由于达尔扈特人在民族文化方面处于突厥语族民族和蒙古民族的结合处，所以他们吸收了萨彦——阿尔泰高原各民族文化的不少成分。S. 巴达姆哈坦论证达尔扈特部族的族源史，缘何强调其与图瓦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这与图瓦地区的历史演变密不可分。图瓦人通常被看作是西伯利亚的突厥人的一部分，和蒙古地区有广泛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在历史上受到了包括突厥语族民族吉尔吉斯人、蒙古的卫拉特人等多重影响。图瓦人又被称作“乌梁海”，同时从突厥语族民族吉尔吉斯人和蒙古的卫拉特人那里获取了文化的和遗传基因的特征。图瓦位于今蒙古国西北部，原为我国领土。都播人是图瓦地区的先民，唐朝以前，先后为匈奴、鲜卑等中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在唐代才和唐朝建立起了臣属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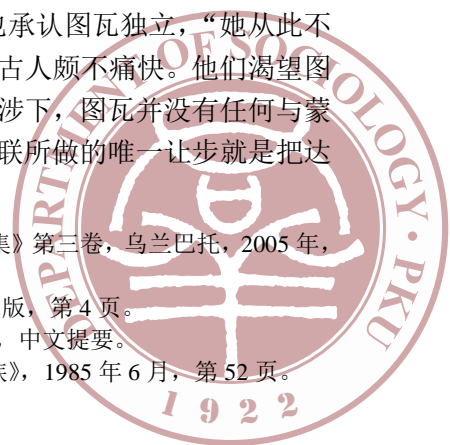
公元6世纪到8世纪中叶，图瓦成为突厥汗国的一部分，继而又处于回鹘人的统治之下。1207年，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进驻图瓦地区，自此，蒙古人对图瓦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4世纪中叶。明朝后期因有乌梁海部落所居，境内有唐努山，因此得名为唐努乌梁海。1726年，清朝曾派遣大臣隆科多等勘查唐努乌梁海地区中俄边界。1758年，清朝在该地区设置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库苏古尔四旗“清政府对唐努乌梁海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部分唐努乌梁海人编为五旗，……另外一部分唐努乌梁海人归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三音诺颜两部王公管辖。唐努乌梁海达尔哈特地方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领地。以上三部分唐努乌梁海人共编为49佐领又一鄂拓克。”³沙俄自19世纪以来，从未放弃对图瓦地区的觊觎，清朝对图瓦也提出主权要求。1921年，图瓦诸旗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苏联也承认图瓦独立，“她从此不再称为（唐努）乌梁海，而改称唐努图瓦。面对图瓦事件的转变，蒙古人颇不痛快。他们渴望图瓦成为蒙古的一部分，并且大多数图瓦人也希望如此。”⁴在苏联的干涉下，图瓦并没有任何与蒙古合并的倾向，1924年蒙苏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不干涉图瓦内政，“苏联所做的唯一让步就是把达

¹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196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4页。

²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前言，乌兰巴托，2002年第二版，第4页。

³ 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中文提要。

⁴ [澳] 麦克尔·安德唐著，刘文远摘译，《图瓦历史及图瓦人》，载于《世界民族》，1985年6月，第52页。



克哈德¹割让给蒙古。”²图瓦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图瓦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大量反政府的意见，政府处理蒙古与图瓦关系的原则尤其受到冲击。1925年各旗旧官员再次提出“同蒙古共和国联合”的愿望。1944年图瓦成为苏联的一个自治州，但图瓦内部多次政治变革都与蒙古内部事件有关。³唐努图瓦被视为苏联亚洲的前线⁴，结合图瓦地区的历史，能够进一步了解 S. 巴达姆哈坦在论证达尔扈特人、驯鹿人与图瓦人族源关系背后更为深层的动机，笔者将其理解为 S. 巴达姆哈坦对俄苏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形势“关心”的潜在对抗。“族群与地域的关系中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则由于历史上曾经居住过或占领过等原因，涉及到目前国境外的地域。”⁵现代达尔扈特人、驯鹿人、图瓦人的祖先，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域迁移，形成了自己传统的居住地域，S.巴达姆哈坦通过对其共同传承的游牧生活方式、氏族组成、如何自称、如何迁徙、在达尔扈特部族形成过程中是否有哈莫尼干人参与、当地人突厥类型的萨满教信仰等问题的观察与考证，发现了其中的联系与相似性。

S. 巴达姆哈坦认为：曾在唐努—萨彦地区最早居住的氏族部落是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从南部（即他们的故乡畏兀儿⁶地区）迁徙而来的 Нэн 族部落，他们被突厥的“秃巴”（Дубо）⁷族人占领后被突厥化，进而拥有了突厥的名称，即现在的图瓦。突厥汗国时期，突厥汗国数次入侵达尔扈特地区，一些突厥语族的新氏族部落也来到当地定居，如达尔扈特部族中的霍拉日（хуулар）氏族就是自那时迁徙至此地定居的氏族。他认为回鹘人镇压了突厥的军队，将达尔扈特地界纳入自己的控制中，图瓦地区现在还有许多回鹘时期的城市遗址。12世纪时，林木中百姓开始迁至 Шишгэд 河谷（叶尼塞河的分支），其中有一支称为乌梁海人。林木中百姓，他们生存在森林中，饲养驯鹿，在山脚下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拉施特在《史集》中将“森林兀良合”和“兀良合”区分为两部分⁸，S.巴达姆哈坦认为，二者在族源上并不相同，森林兀良哈是现今蒙古国驯鹿人、图瓦托金人和乌梁海人的祖先。在这方面他同意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森林兀良哈曾经是早期 Нэн 族和突厥氏族部落的成员。秃巴族人的生产活动、风俗习惯依然保存在 20 世纪中期的蒙古国驯鹿人和图瓦的托金人中。

关于“乌梁海”的名称起源，S. 巴达姆哈坦认为乌梁海内部各部落虽然名称相似，却有不同的族源。他考证出乌梁海这一称谓不是自西向东，而是自东向西传播，这一称谓除了在唐努—萨彦，库斯古勒附近的居民中使用以外，也代表了阿勒泰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这些自清朝被分离出唐努山的居民。他所提到的唐努—萨彦一带的乌梁海，即中文文献中的“唐努乌梁海”，其内涵是十分复杂的，他提出，几百年的征战不同部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图瓦人就是在长期

¹ 即达尔扈特。——笔者注。

² [澳] 迈克尔·安德唐著，刘文远摘译，《图瓦历史及图瓦人》，载于《世界民族》，1985年6月，第52页。

³ 1958年牵涉到蒙古的边境事件。参见[澳] 迈克尔·安德唐著，刘文远摘译，《图瓦历史及图瓦人》，载于《世界民族》1985年6月，第52页。

⁴ William Ballis: *Soviet Russia's Asiatic Frontier Technique: Tana Tuva, Pacific Affairs*, Vol. 14, No. 1. (Mar., 1941), pp. 91-96.

⁵ 马戎，2001，《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15页。

⁶ 畏兀儿：又译畏吾而、伟兀、卫吾、委兀、瑰古、乌鹘、外吾，皆“回鹘”蒙古语读音的族名。一般指高昌回鹘。公元9世纪时据有以哈刺火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和别失八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为中心的的地区。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151节，2005年12月第一版，第278-279页。

⁷ 秃巴昔（Tubas-i）种行。秃巴：部落名，即唐代的都波或都播。《元朝秘史》以复数形式译为秃巴思。居于唐麓岭（今唐努山）北今乌鲁木齐河和克穆齐河流域，蒙古人以此两河之名称呼此部，汉译谦州，当今土瓦人。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151节，2005年12月第一版，第238页。

⁸ Урянка：兀良合，Урянка, лесные：森林兀良合。这个部落出自上述乞颜和捏古思的氏族，另有一群人被称为“森林兀良合惕人”，但这些人与他们不同。这个森林部落[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境内，那时住有豁里、巴儿忽惕和秃马惕部落；他们彼此相近。正如前篇所述，他们的部落和[部落]分支，不是原来的蒙古人。[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5页。



历史发展中由使用突厥、蒙古、通古斯这三个语族语言的部落逐渐融合而成的现代图瓦人。深入研究蒙古人民共和国某些部族复杂的民族起源问题，特别是达尔扈特人复杂的民族起源问题，能够澄清一系列与蒙古人的古代史，与他们在民族遗传方面同突厥人、通古斯-满洲人及中亚其他民族相互联系的问题。因此，在考察达尔扈特地区的历史文化时，他从族源上梳理了突厥语族图瓦人与达尔扈特部族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对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相互影响的研究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研究方面，S.巴达姆哈坦的著作具有特别意义。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这本书中，他完全按照民族学大纲对达尔扈特部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做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既与大的民族共同体——以喀尔喀人为主体的蒙古民族进行了比较，也与生活在唐努-萨彦岭一带的图瓦人等小族群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和生产生活的横向角度同时梳理，将达尔扈特部族的物质文化置于跨国、跨族群的背景中，从而展现了多民族、多部族文化如何被吸纳到小民族共同体、小民族共同体又如何融入大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小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问题，比人口较多的民族部族更为复杂，S.巴达姆哈坦根据丰富的实地调查材料，从畜牧业、手工业、居住模式、装饰艺术、亲属称谓等方面，撰写了达尔扈特部族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方面与周边族群的关系问题，用达尔扈特部族的发展过程反映出民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小民族部族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

畜牧业是达尔扈特部族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在当地，个别氏族也同时经营狩猎业、捕鱼业、采集业、家庭手工业等辅助生产方式。虽然喀尔喀文化早在14世纪便随蒙古人的征战被带到达尔扈特地区，在当地人的经济生产中依然保留了许多独特的风俗，这些特殊的生产方法在唐努-萨彦附近的部族中广泛传播，与图瓦人的生产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建造棚舍的模式¹、使用套绳套马的习俗²（而不用套马杆）、狩猎方法等。S.巴达姆哈坦对当地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族群关系问题进行了这样的分析：“达尔扈特地区从事驯鹿业的人，曾经是图瓦山的托金人的一支——图瓦人，他们于18世纪开始慢慢移至山脚下，开始从事畜牧业，渐渐加入达尔扈特部族的组成中，忘记了驯鹿生产的方法，融入了新的生产形式。”³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达尔扈特人的驯鹿方法，属于唐努-萨彦类型，这与图瓦的驯鹿经济方式是同源的。这段论述从经济生产的角度再次证明达尔扈特人与图瓦人的族源关系。在手工业制造方面，他指出达尔扈特人与喀尔喀人基本相同，只有制毡方法由于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与突厥语族民族中盛行的纺织方法相似。虽然达尔扈特人的畜牧业生产工具与其他蒙古部族没有区别，但他们的狩猎工具类型却与西伯利亚、唐努-萨彦部族相同，他用实物史料证明了达尔扈特人的狩猎文化受到了早期周边氏族文化的影响，这些周边氏族曾加入了达尔扈特部族的形成过程，他们的血统亦保存至今。⁴

达尔扈特人建造棚舍的技术是当地人与周边部族往来的结果。S.巴达姆哈坦通过田野调查主要发现了两方面内容：其一、这些技术具有唐努-萨彦附近部族的特征，在他看来，达尔扈特人的畜牧方法与图瓦人、布里亚特人相似，这是早期贸易往来推动外来文化向达尔扈特地区传播的结果，他批判了一些学者认为达尔扈特人不懂得这项技术的偏见，证明了他们掌握棚舍建造技术

¹ “幼畜的棚舍、马的围栏主要建成四方形，其余的牲畜围栏由4—9个立面组成。如果说喀尔喀人建造的围栏立面之是缝合的，那么达尔扈特人建造的围栏，则在每两个立面间竖起两个2米高的圆木，稍部互相留着50厘米的空隙，可以使之平衡。” S.巴达姆哈坦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98页。

² “达尔扈特人的一个特点为，抓马时使用套绳索套马，这一方法在唐努-萨彦、阿尔泰部族间非常流行。喀尔喀、布里亚特等部族主要使用套马杆套马。为牲畜烙印后，有主人为所有参加烙印工作者献茶的习俗。”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03页。

³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13页。

⁴ “例如：弩箭、弓箭、渔板、手锹、渔叉等铜制工具制作方法，与图瓦、布里亚特、Hagas等部族的制作方法完全相同。”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24页。



的必然性。其二、喀尔喀人建造棚舍的技术并没有传入达尔扈特人中。“这证明了达尔扈特人与喀尔喀人自古以来就没有太多联系，然而勿需置疑，全体蒙古人的民族文化在古代已经影响了达尔扈特人。”¹ 喀尔喀作为蒙古民族的主体部族，其文化没有深刻影响达尔扈特人，由此可见，达尔扈特人接受的是整体蒙古民族一般性的文化传统，是各部族在历史上影响的结果。他指出“到处皆是历史各时期迁徙而来的蒙古民族、部落联盟，他们适应了当地的特殊环境，将从前的生产生活方式、方法在生活中加以利用。”²

虽然现代达尔扈特人的基本居住形式是蒙古包，但他们同时也保留着祖先遗留下来的居住特点，即 *урц*、*шоовонтой гэр*、*пүнз*。达尔扈特部族内部从突厥人、*Нэн* 人所继承的居所本称为 *өүке*，*урц* 是当地人对此的称呼，被蒙古人征服以前，他们一直居住在 *урц*，蒙古包则随着蒙古人的征战而第一次传到当地。S. 巴达姆哈坦对居所称谓做了对比，“*Урц* 的分类名称 *урцыг-өүке*，*урцны модыг-алааж*³等都是突厥语，驯鹿人、图瓦人称其为 *урцаа өүке*，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后，又称为 *овоохой*。这证明了达尔扈特人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毡包的传统。”⁴不仅如此，蒙古包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达尔扈特和图瓦人早期使用的锥形天窗形式。另外，S. 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地区的毡包类型、家具用品名称进行了总结与分类，并将之与喀尔喀人的概念进行对应⁵，由此可知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它们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和重组。

达尔扈特的装饰艺术与邻族文化更有着密切联系。装饰工艺之间的独特性以及与其他部族方法的对比，可以追溯工艺产生的源头。例如在在马具中雕刻鸟的形象，是达尔扈特人的早期传统，并且具有氏族早期崇拜的含义——骑马与飞翔等同。这都是早期文化在实物史料中的反映，对族源、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马具雕刻鸟的形象之传统，早在突厥部落中广泛流传，达尔扈特部族的成员构成中具有突厥语族部落的成分，并且早期突厥文化源头在达尔扈特文化中得以保存，其文化对达尔扈特人的手工艺产生影响，被纳入达尔扈特文化中。另外，达尔扈特男子的垂饰与全蒙古人没有差别，但有一点特征：垂饰图案和造型与喀尔喀有许多不同：云纹、鱼纹、鸟纹。S. 巴达姆哈坦认为这三者都是早期蒙古或突厥民族广泛流传的花纹，是早期灵魂崇拜的产物。在萨满教产生以前，早期氏族崇拜的对象是：满足氏族联盟生活的重要必需品，猎物、鱼类等生物，图腾崇拜的传统属于猎人的习俗。达尔扈特地区的女性可以使用刀，考虑到这里曾经生活着以狩猎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驯鹿人、乌梁海人等。这些族群的女性直至 20 世纪仍然有佩戴刀的传统，从这看来，可能是受到早期氏族文化传统和狩猎文化的影响。达尔扈特人的装饰品在 18 世纪受到喀尔喀、辉特文化的影响。因为在达尔扈特地区北部居住的 *Шишгэд*，*Шарга* 一带并不使用这些饰品，而是接近喀尔喀、辉特的居民制作饰品，从而传入整个达尔扈特地区。

3. 对游牧文明传统独特性的研究

对民族传统独特性的研究，一直是民族学家的关注重点。“民族学作为研究实际发挥功能的传统的物质文化形式的基本学科，它不得不保证对物质文化也要进行具体的社会学研究。”⁶在 S. 巴达姆哈坦笔下，零散的物质文化研究构成一个完整的集合体，“对于民族学来说，这些综合体只有当它们具有民族独特性时才是有意义的。”⁷正是这一系列物质文化传统赋予并巩固了民族长

¹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 年出版，第 99 页。

²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 年出版，第 99 页。

³ *Алааж*，*alaaju*，意为草棚、窝棚，《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147 页。

⁴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 年出版，第 132 页。

⁵ “*анхны сууц-урц*，*удаахь сууц-монгол гэр*，*ихсийн гэрийн-өргөө*，*нүүдлийн гэрийн-жогвон*，*бадарчийн сууц-жодгор*，*аяны сууц-майхан*，*ядуусын сууц-улаалж*，*гөрөөчний сууц-овоохой*，*добрд гэр-хаггуур* 等”，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34 页。

⁶ [苏] Ю.В.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一版，第 273 页。

⁷ [苏] Ю.В.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一版，第



期持有的独特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扈特部族的经济基础是畜牧业，一直具备游牧和自给自足的基本特征，繁殖牲畜的方法完全受自然条件所控制。他们利用畜牧业各种产品来满足生活需要的生活方式是从几千年前沿用至今的传统方式之一。因此，S. 巴达姆哈坦对畜牧业生产的调查目的是：“对达尔扈特部族繁殖牲畜的百年方法特征加以研究，了解达尔扈特人如何工作。”¹他分析道：库斯古勒省的特殊地形，决定了达尔扈特人的游牧分为山地游牧和草场游牧两种类型；然而根据当地人的访谈，他又注意到在达尔扈特部族具有远处游牧和近处游牧的内部分类，主要是依据游牧方向、游牧次数来区分的游牧类型。他的描述和分析集中于当地人对游牧类型内部分类的探讨²，用具体田野调查实例反驳了一些学者对森林地带游牧情况的偏见³，并对“富人帮助”（баянчуудын тусламж）、“牲畜驮运”（нуруу ачилгаа）等传统现象做出了解释：由于畜牧业生产的特殊性，牧民在生产中需要联合抵制自然灾害，形成“富人帮助”（баянчуудын тусламж）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当时的封建社会压迫情况相混合，形成了独特的游牧现象。“牲畜驮运”（нуруу ачилгаа）是达尔扈特人的基本游牧方式，与驯鹿人完全相同，是受到地理条件影响的游牧方法。与喀尔喀人不同的是，达尔扈特人将行李置于犏牛背上，不是牵行而是同时驱赶，有时候也把物品搭在牛背上将儿童捆在牛上骑行，“这在外人看来也许不能接受，但是当地人世代传承这种传统游牧方法，因此并不在意。”⁴

S. 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部族游牧传统独特性的类似观察和总结颇多，在此不赘述，“在文化所起的为数众多的作用中间，特别指出它的民族功能看来是合理的。在我们看来，执行这个功能的是文化的民族区分特性和民族一体化特性的总和”。⁵这些文化传统上的不同，是民族部族特征的标志，它既联合了达尔扈特人与驯鹿人、图瓦人等，又区分了喀尔喀人，它具有稳定性、继承性，甚至带有文化遗产的色彩，在反复对比中，达尔扈特部族的特性中无数零散的“日常实践”被确立起来。然而 S. 巴达姆哈坦的观察和思考并没有局限在此，他将整个达尔扈特部族的文化层次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之中，他从对库斯古勒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到民族志成书，先后用了8年时间（1958-1965），这恰好处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胜利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过渡阶段⁶，这使达尔扈特部族传统及生活方式变迁的研究具有了空前的意义。民族学是一门实用学科，通常来讲，学者的参与对小民族部族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S. 巴达姆哈坦的调查研究紧密地联系社会实践，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分析，切实地关注了发生在达尔扈特地区——处于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巨变。

4. 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社集体化的研究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古人的经济一向是自然经济，其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性，频频

273页。

¹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90页。

² “达尔扈特人的迁徙（尤其是远处游牧），主要以冬夏营地为主，春秋宿营是过渡状态。冬营地有远近两种类型。远处游牧是富人与中产阶级牧民主要采取的游牧方式。”“在游牧方向方面，近处游牧与远处游牧一样，（冬季上行，夏季下行），游牧距离和次数都各不相同，对于近处游牧者来说，春营地、秋营地的宿营地较之远处游牧来看，更加清晰。近处游牧在整体上，游牧距离、游牧方向、游牧次数，相互间都是相似的。近处游牧每年更换4—8次地点，大约游牧30—50千米。近处游牧者每年游牧的距离短、游牧次数少，是小型活动，其一，是因为缺乏交通工具，其二，生活的主要来源——牲畜数量少，因此在近处减少迁徙，能够为牲畜提供抓膘的可能。基于这两个根本原因，不能进行远处游牧，成为利用周围环境的近处游牧。”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95页。

³ 一些学者认为森林地带游牧的数量、距离，要短于草原游牧。——笔者注。

⁴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96页。

⁵ [苏] Ю.В.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 刘宇端著：《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第57页。

⁶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蒙古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期（1921-1940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胜利时期（1941-196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1-1990年），民主改革时期（1990年至今）。——笔者注。



被当时各地的旅行家们所指出。在 S. 巴达姆哈坦看来, 清朝与沙俄对蒙古地区的影响, 导致了达尔扈特部族与其他部族民族的隔离, 使文明极为落后, 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当地贫困、愚昧、落后的社会状况。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将私有制的游牧经济变为前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政府创立了官僚者和技术员的小阶级, 义务兵役提供了机会来向年轻人灌输大集体的思想。牧民被长期剥夺了他们的领导资源——蒙古王公和喇嘛后裔。……像缝纫机和铁炉等日用品, 已经作为新政权的标志在蒙古包中的出现。他们的牲畜被纳入国家兽医服务的检察中, 也成为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他们依赖着国家对消费品的储备, 因为他们不能自己生产。但只要他们能够依赖他们自产的消费品, 他们就能够保留一部分经济自由。”¹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梁海地区设置了人民临时政府, 削弱了鄂托克和宰桑的权力, 设置达尔扈特管辖者, 确立了达尔扈特的边界, “这是在达尔扈特地区第一次建立民主政权的步伐。”²

如果说自治蒙古社会制度的根本特点表现在鲜明的神权性质上, 那么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却在苏联的引导下投入到“新的使命”中。为了排斥北洋政府的高利贷资本, 政府在 1921 年 11 月批准了合作社章程, 12 月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立。“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政府以建立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开始了把外国掠夺资本全部排挤出蒙古市场的斗争。这是巩固国家的民族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条件。”³ 自 1940 年开始, 蒙古人民政府制定的重要目标是, 巩固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经济, 竭尽全力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 增加牲畜头数和畜牧业产品。此后, 在蒙古国库斯古勒省出现了鱼工厂、奶制品工厂等, S. 巴达姆哈坦称其为“蒙古国新工业的开端”⁴。1948 年人民大呼拉尔第 11 次会议中, 提出了蒙古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48-1952 年), 1954 年又确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 其主要关注的内容是建设人民公社, 在牲畜业生产方面巩固社会主义建设, 将蒙古国牧民、人民、工作者都变成畜牧业社会主义形式的公社成员。S. 巴达姆哈坦在民族志中对其中的“幸福公社”和“黄金牧场公社”进行了描述, 他统计了 1957-1963 年间公社的家庭、人口、牲畜(骆驼、马、牛、绵羊、山羊), 认为这两个公社已经成为现代畜牧业公社, 在落后的达尔扈特地区产生了新经济, 并得以发展和巩固, 形成了全面保护社会主义畜牧业新形式的大型经济模式。⁵“黄金牧场”公社是合并而来, 对巩固公社建设有重要意义。他认为, 这些公社所取得的成就是蒙古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农牧业方面取得胜利的重要例证, 与四十年前落后的情况相比, 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⁶

S. 巴达姆哈坦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达尔扈特人带来的新变化, 切身关注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改造, 他的研究不是为了提出理论而是为了实际的目的, 即在研究过程中帮助当地人发展, 为社会变革提供事实的依据, 服务于当地人的切身利益。

5. 对达尔扈特地区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研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达尔扈特人, 属于封建喇嘛的牧奴、博克多格根的沙比⁷, 其社会关系具有封建压迫与早期氏族家庭关系残余相混合的特点。S. 巴达姆哈坦从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入

¹ George G. S. Murphy, “Planning i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8, No. 2. (Feb., 1959), pp. 241-258.

²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 第 3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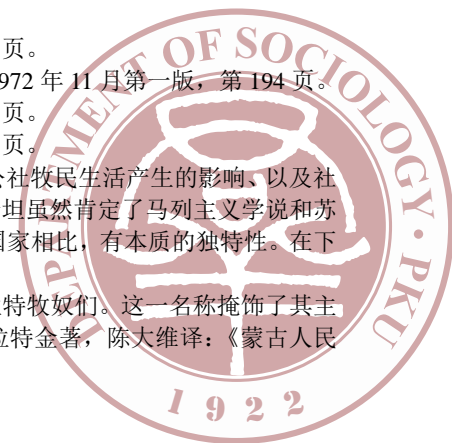
³ [苏] 伊·亚·兹拉特金著, 陈大维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 商务印书馆, 1972 年 11 月第一版, 第 194 页。

⁴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 第 40 页。

⁵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 第 47 页。

⁶ 20 世纪七十年代, 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主要以现代民族学发展进程对公社牧民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和确立进程为主, 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 S. 巴达姆哈坦虽然肯定了马列主义学说和苏联经验的指导作用, 然而又提出了蒙古国民族问题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 有本质的独特性。在下一章中我们再进一步探讨。——笔者注。

⁷ 沙比: 是门生的意思, 在蒙古就是这样称呼那些依存于寺院王公及寺院的阿拉特牧奴们。这一名称掩饰了其主人, 即寺院封建主, 对沙比剥削的典型牧奴制的形式。——[苏] 伊·亚·兹拉特金著, 陈大维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 商务印书馆 1972 年 11 月第一版, 第 36 页。



手，阐释了当地封建落后的社会关系在人民革命期间向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的过程。在达尔扈特部族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氏族关系、家族关系和姻亲关系，突厥语族的传统习俗尚存其中。S. 巴达姆哈坦认为，当时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为和屯阿寅勒联合体（хот айлын нэгдэл）及其成员之间的联系。蒙古语中的阿寅勒，是若干个帷幕和幌车组成的牧营或牧户，通常是以个别家族或以二、三家族组成的小团体，在一块不大的地面上游牧；和屯的游牧方法即以十个到三十个以上的牧户（阿寅勒）组成的，规模相当庞大，几乎永远是同族人集体进行的游牧。¹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游牧生活一般地暴露出一个重大的矛盾。用大的牧群的方式来游牧，对于牲畜成群的富牧户，特别是牧马的人，并不方便，出于对自己的畜群和马群的关系，迫使他们不得不追求以阿寅勒进行放牧的较为自由自在的生活。……当中产者和贫穷者以集体（和屯）进行游牧的时候，富有者便力求，并且也不得不以阿寅勒去单独游牧。但是，以阿寅勒游牧，即以孤立的小集体去放牧大量牲畜，只在社会秩序安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²

S. 巴达姆哈坦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达尔扈特人的游牧，划分成三个类型：其一、亲属家族联合和屯阿寅勒；其二、富人穷人的联合和屯阿寅勒；其三、中产者的联合和屯阿寅勒。他的分类依据了当时达尔扈特人的社会结构。S. 巴达姆哈坦指出，早期氏族联合的形式在封建社会中发生了变化，即保存着氏族生活的残余，又具有共同生产、相互帮助的特点。他将亲属家族联合类型进一步分为近亲³、远亲⁴和屯阿寅勒，将这种现象归因为“除经济因素外，在民众意识中还存在着早期的伦理和秩序传统。”⁵他认为穷人与封建主的联合游牧，是穷人受制于生活所迫的结果，与喀尔喀台吉的牧奴不同，他们自己拥有薄弱的经济，有可以离开富人的独立自主权，却依然受到封建社会的剥削。在上述各种游牧关系中，他多次强调封建社会制度在其中起的作用，例如认为亲近联合游牧是一种“不公开的剥削”、远亲联合游牧则“在亲属互助的名义下，具有牧奴制的压迫和剥削的潜在形式”。只有中产者的联合才“以工作目的相互依赖，在季节的条件下暂时联合的一种游牧联合体。”⁶这种联合游牧的类型被归因为人力畜力短缺而造成的，是在自愿确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不具有任何剥削的形式。

（三）《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的民族志方法

田野工作是民族学家最重要的经验，是他民族学知识的切身来源，也可以说是其学术生涯的洗礼。每个民族学家可能都有“他的‘村庄’、他的‘族群’，也就是他最熟悉的田野调查的地点和当地的人们。”⁷S. 巴达姆哈坦在进入田野前，已经准备好了他的问题、理论与方法、对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方案，以及分析与写作的方式。在田野作业的每个环节，他都需要用已掌握的综合知识，来辨析不同资料有价值的部分，他的学术造诣为其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经验，使他的民族志书写充满了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层级学科的研究方法。下文将从调查方案的设置、正史与口述史相结合、对民间知识本土化的解释三个方面来分析 S. 巴达姆哈坦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所运用的民族志方法。

¹ [俄] Б.Я.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第一版，第 296 页。

² [俄] Б.Я. 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第一版，第 38 页。

³ “近亲和屯阿寅勒联合游牧的主要原因是：父权制时期大家族生活的风俗传统依然保留，氏族生活时期的公有制也间或可见。……主要以 2—4 户人家为主。”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64 页。

⁴ “远亲和屯阿寅勒联合游牧主要由父亲的母亲亲属组成，有 2—3 户人家，每户人家在人力财力方面往往不同，对贫穷的亲属在物质上给予帮助，按年纪尊长或财力大小来管理此联合体并为其命名。”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64 页。

⁵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63 页。

⁶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66 页。

⁷ 凌纯声、林耀华等：《20 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一版，第 4 页。



1. 调查方案的设置

“用田野工作得来的个案材料建立假说和解释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工作的特色之一，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已经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科学的民族志包含着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其一、选择特定的区域；其二、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其三、能够使用当地的语言；其四、先从本土观点的参与体验，但是最终要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¹S.巴达姆哈坦在《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²一文中对民族学研究和范围进行了限定，将民族志调查按内容和方法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旅行研究³、特定研究⁴、专题研究⁵，这些研究能够全面解释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第三种类型与他的自身经历更加吻合，《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就是最好的明证。蒙古国院士 Ts.达赖曾这样回忆这位民族学家：“巴达姆哈坦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的特点是非常认真，孜孜不倦。在库斯古勒省达尔扈特部族的多年研究工作，是值得赞扬的。有一次，我与她一起居住在驯鹿人家。连我都不甚清楚他在那里工作了多久，然而哈坦却很高兴，也像一名驯鹿人一样。我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和驯鹿人待在一起？哈坦大笑着说道：我已是这儿的女婿啦，驯鹿人都是勤劳善良的人。他又非常严肃地说：‘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如果现在不对他们进行观察和研究，就来不及了。我注意到他们住在草屋里，喝茶吃饭，小伙子与姑娘们相爱，学习骑驯鹿。我的专业工作目标就是这些。’我住了几天就回去了，留下了哈坦独自一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达尔扈特部族研究的著作中，《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人人知晓。”⁶

然而，S.巴达姆哈坦在文章中提到的调查方案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也不是苏联民族学派所独有的。例如深受历史民族学影响的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提出过相同的旅行研究方法，因此要对其加以辨别。如果追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民族学，可以知道那时第一次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家的学者队伍⁷，这一切首先在田野搜集工作上产生了影响。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民族学资料出自旅行家、博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简述，他们无人接受过民族学的训练。大约自 19 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出现了由专业人员撰写的第一批民族学专业著作和田野调查记录，即民族学科学考察旅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学的实际材料大幅增加，民族学出版的学术水平也较从前意外的观察者记录的质量高出很多。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历史民族学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提倡，他们信仰实证主义哲学，用民族学资料研究社会问题，许多民族学著作都注重对社会的整体研究，重视知识、承认历史过程的规律，认为这些可以为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提供资料。美国历史学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任务就是寻找人类历史

¹ 高丙中：《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思想战线》2005 年第 1 期，第 75 页。

² 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4 页。

³ “旅行研究首先要前往从未被研究的地点，对当地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特征进行表面性描述，在此基础上绘制当地民族、部族分布地图。通常旅行研究会为下一步方案的执行选择调查地点，通过地图来了解还有哪些人在语言、起源等方面与当地居民的情况相接近”。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版，第 5 页。

⁴ “特定研究应对调查点和当地人的生活情况有提前认识，与旅行研究相比涉及了更深的内容，并需要长期融入当地生活，对当地文化及风俗进行调研，应与旅行研究相结合。专题研究可以在任意时间进行，调查时间应依研究者的调查条件而定。其主要形式为，在每个季度进行 1—2 个月的调查，此举可以深入了解当地人如何将生活与季节相适应。”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版，第 5 页。

⁵ “专题研究以了解某一县或苏木的专门历史为目标，因此研究时间根据研究者的资料准备程度而定，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当地定期工作几年，这样才能解决当地人民起源、历史分布、经济生活的发展阶段问题。”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5 页。

⁶ Ts.达赖：《我的朋友巴达姆哈坦》，《民族学研究》2004 年，乌兰巴托，第 165 页。

⁷ 泰勒、卢伯克、麦克伦南、魏茨、利珀特等。[苏] IO. B. 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 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4 月第一版，第 90 页。



和文化发展的规律的观点。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特殊的，应力求以事实确证来阐明见解”¹，历史民族学派做了大量田野调查，掌握了详尽的民族学资料。

2. 文献史料与口述史相结合

在民族学调查中，仅靠调查者个人观察和所准备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的资料主要依靠当地人提供。在许多优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中，许多关键性的材料往往是根据这些人的口述整理的，或在他们的协助下获得的。S. 巴达姆哈坦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详细考证了正史、史学著作和档案资料，利用大量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民间口述史，作为精英历史的补充。在访谈中，他特别强调“要清楚地了解访谈对象内心的真实想法”²，他重点提出了几点要求：让访谈者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自己的想法；不要打断谈话，在访谈结束后再进行补充提问；使用当地人的方言及专有名词记录同样的问题；调查当天务必重新阅读所记录的内容，对存疑之处重新访谈，如有新的想法或问题，可将其写入记录或加载于问题中。利用民间的口述史料，他解决了许多正史或档案记载中未解的难题，仅以达尔扈特人的起源问题为例：

S. 巴达姆哈坦认为，研究达尔扈特起源最基本的材料是口头传承并保存至今的氏族名称，这些氏族名称能够真实地反映他们的起源、迁徙和历史问题。通过对年长者的访谈，他清楚地统计了历史范围内的达尔扈特部族各个氏族，并将 J. 策旺 (Ж. Цэвээн)、G. D. 桑杰耶夫 (Г. Д. Санжеев) 曾经记录的结果进行对比，得出应增加 16 个新氏族的结论。在对黑达尔扈特 (хар дархад) 氏族来源的研究中，除了参考历史文献记载以外 (《蒙古秘史》、《史集》、《王公表传》)，他找到一位老人³讲述的书籍《达尔扈特人起源的历史》(“Дархад хүмүүсийн анхлан буй болсон түүх”)，那本书已经失传，S. 巴达姆哈坦将老人对书的记忆记录下来⁴，并且尽量搜集了其他讲述达尔扈特人来历的相关传说⁵。他认为，在达尔扈特当地居住的氏族部落既有原驻民，也有由 Хараа, Ерөө 迁徙而来的居民，迁徙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止刚刚成为博克多格根沙比的乌梁海人与卫拉特人结盟，然而这些背景离乡的人思念故土，又迁回了乌梁海的故乡，因此出现了“黑达尔扈特”这个从达尔扈特内部引申出来的新称谓，意为“从外部迁移过来的其他鄂托克居民”。这些结论都是 S. 巴达姆哈坦在史料不足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访谈而推断出的，在他看来，“保存至今的传说源自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虽然几百年来不断变异，但是保留了基本原意，因此具有历史真实性。”⁶

由此段论述可以看到，S. 巴达姆哈坦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充分运用了人类学调查方法，

¹ 马克继：《历史民族学与民族历史学简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46页。

² S. 巴达姆哈坦著：《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7页。

³ 老人名为 Дамдингийн Дүвжир，属于 Урьд 氏族。S. 巴达姆哈坦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59页。

⁴ “很早的时候达尔扈特当地荒芜人烟。一个名为成吉思汗的人渡过腾汲思河，住在这里打猎的时候，几个人从 Хараа, Ерөө 出发为了与成吉思汗见面而来，回家乡之后说：腾汲思这个地方是打猎的好地方，于是将人们带到此地，建立了行政机构，开始生活在这里。就这样生活着，直到满清的时候又被收回至 Хараа, Ерөө 的地方。但是，回到 Хараа, Ерөө 的人因为想家，怀孕的母马流产了，怀孕的母亲也流产了，不适应，所以人们穿着用狍子皮做的大衣，戴着有狍子角做的帽子，向博格多汗说明情况，同意这些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成为达尔扈特沙比。于是他们被赐予达尔扈特的名字。从此以后，他们自称达尔扈特，成为博格的达尔扈特，不用服兵役也不用纳贡，只向博格多交纳黄茶税。于是又来到了 Шишгэд 地区。但是没有来到 Шишгэд 地区的人们留在了 Хараа, Ерөө。留在当地的人称做 Хэвгэрэн 达尔扈特。在 Хараа, Ерөө 地方居住的人是从 Онон, Улз 分离出来的布里亚特民族。” S. 巴达姆哈坦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第59-60页。

⁵ 传说一：在达尔扈特地区原来居住着乌梁海人，并且他们的首领将管辖的人献给大格根，使他们成为大格根的达尔扈特沙比。成为达尔扈特沙比之后，他们虽然被迁移到 Хараа, Ерөө，但是他们水土不服就又返回了原地。” S. 巴达姆哈坦著：《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60-61页。传说二：我们达尔扈特人从来都没有迁移至 Хараа, Ерөө，原来一直都在这里生活着。

⁶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60页。

来弥补正史及档案资料的缺失，他兼顾历史事件与民间的记忆，既有描述又有解释和比较，用田野资料再现了鲜活的历史场景。

3. 对民间常识的解释

人类学家探求亚群体或社区的错综复杂性以描述其所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研究这些细节的过程中，他们总是会找出那些使得整个秩序系统运作的潜在力量。这些文化要素能统合或分裂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或者信仰，但它们往往有共享的焦点。¹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记录的文化，是 S. 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部族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观察记录的总和，在这些基本事实背后，实际包括了当地人的思想、信仰以及知识等“表现特定群体人们特征的因素”，他不但了解这些文化行为，并且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观察视角以便能够描述这些文化，然而我们从他的写作中也能发现，他并不着重发掘当地人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中的思考和行为，而侧重于考证这些独特文化现象的来源，或者说这些文化的享有者之间的族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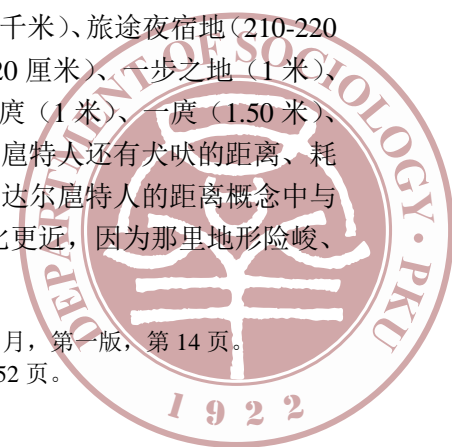
上一小节中，我们提到了 S. 巴达姆哈坦关于“富人帮助”与“牲畜驮运”的描述，下文将以饮食禁忌和女性佩饰的记录为例，对他的民族志书写做进一步分析。他在田野中观察到，达尔扈特人拥有特殊的饮食价值观，遵循着独特的饮食禁忌：他们食用牛、绵羊、牦牛肉，视马肉为格外珍贵，S. 巴达姆哈坦认为，原因在于马肉较之其他肉类能提供更多的能量，来满足达尔扈特人抵御山林地带严寒气候的需要。他还观察到，达尔扈特人认为羊脑对人脑具有治病功能。他认为这是一种早期的传统知识，图瓦人曾经拥有类似的饮食传统，但是否完全掌握达尔扈特人的制作方法还不曾确定。另外，男人女人和儿童各有红食禁忌，例如，儿童不能吃腰子、尾巴、肺、心脏、肝等，被认为是这些部位都是柔软的，不利于儿童健壮地成长。鸭、脑、骨髓等若给孩子吃，会把孩子变笨、使他流鼻涕、让其不能学习。如果将头骨打碎给男子吃，不打碎是不能给女人的。羊、马的头不能随便挂起来而要挂在高处、树枝上。不能打碎种马、种牛、种羊尤其是种羊的头，剔肉后要将五种颜色的布料缠在它的角上，放在圈上。50 岁以上的女人才能够啃肩胛骨等等。²他完整地描述了达尔扈特地区的饮食传统，记录了民间解释，却没有面面俱到地给出进一步分析。达尔扈特的女性佩饰中也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女性对刀具的佩戴，这种习俗是在依靠狩猎为生的早期氏族中产生的，女性参与狩猎后的工作：剥皮、卸羊、处理内脏，因此是生产生活的需要所致。他认为，女性在狩猎时期的佩戴刀具传统保存在达尔扈特人中，因为当地居住着曾经从事狩猎生活的驯鹿人、乌梁海人等群体，这些群体中的女性直至 20 世纪仍然保持着这种习俗，因此这或者说是祖先留下来的传统，或者说是受到了狩猎居民文化影响的结果。

除了通过民间常识追溯民族文化的源头，S. 巴达姆哈坦在写作中搜寻了当地“内部的”术语，并将其与“外部的”术语进行了仔细而严谨地对照，用实实在在的民间常识记录了达尔扈特人在自己人中间使用的生活符号：

“达尔扈特人对年、月、日的计算与蒙古人完全一样，使用占星术，然而他们对长、短、轻、重的概念有独特的理解。例如：他们将远距离分为拴马的地方（25-50 米）、牧羊场地（1-2 千米）、牧牛场地（2-2.5 千米）、牧牛犊场地（1 千米）、牧羊羔场地（500-1 千米）、牧母马场地（4 千米左右）、半天时间（40-45 千米）、一天时间（90 千米）、一昼夜（120-130 千米）、旅途夜宿地（210-220 千米）等等。他们又将近距离分为靶子之地（50 米）、弓箭之地（1.20 厘米）、一步之地（1 米）、载运皮革（3-4 米）、拴马皮革（4-6 厘米）、一肘之地（33 厘米）、半度（1 米）、一度（1.50 米）、一拃（20 厘米）、一小拃（15 厘米）、一根手指（2 厘米）等。达尔扈特人还有犬吠的距离、耗牛的距离、艾勒艾玛克距离等对长度的衡量方法。”S. 巴达姆哈坦将达尔扈特人的距离概念中与喀尔喀人做了比较分析，认为其草场距离、昼夜距离与喀尔喀人相比更近，因为那里地形险峻、

¹ 大卫·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第一版，第 14 页。

² S. 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 2002 年出版，第 152 页。



草场丰美。在喀尔喀人的近距离概念中，用骆驼的运载工具绳子、骆驼鞍褥衡量，这在达尔扈特人中是没有的。但是用牲畜背部运输的皮带衡量，反映了在古代达尔扈特地区，骆驼并不像如今这样普遍，运输车也没有占主要地位的情况。其他度量衡与蒙古人普遍相同。衡量重量的办法也是早期流传的最普通的方法，达尔扈特人测量重量的传统方法是用装在皮囊中的奶干逐一衡量的。生活中定期需要的皮革器具在重量方面的参照点，是源自生活的民族知识的一种。

S.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人生活常识的分析，以喀尔喀人作为衡量的标准，喀尔喀人的常识属于他自身的文化体系，达尔扈特人的常识相对于他，属于异部族的文化体系，他用自己的观察、智慧和领悟，再现了达尔扈特人自古以来对自然、宇宙的理解和认识，肯定了其“对人民进步文化知识史的研究”价值所在——“因生活需要创作和利用而产生的传统明确的知识经验”¹，反驳了“将民间知识单方面认为每一件都与灵魂崇拜、宗教信仰有关的落后蒙昧”的观点。

（四）《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的评价

S.巴达姆哈坦对达尔扈特部族来讲，并不是外来的民族学家，但是达尔扈特部族对属于喀尔喀部族的他来说，无异于一个“少数民族的边疆社会”，是蒙古国境内的“内在他者”，对这个个案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民族志方法的探讨，而要将这部个案纳入蒙古国整体的、历史文化，在综合的广阔视野下进行分析。蒙古国后世民族学家对这部专著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即肯定了S.巴达姆哈坦作为民族志书写奠定者的地位，他的民族学理论建构和民族志写作方法，开启了蒙古国民族学实地考察的先例，成为蒙古国民族志书写的典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他对民族起源问题、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关系问题、游牧文明的独特性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社集体化的问题、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用漫长的田野经历、扎实的实地调查方法搜寻大量社会事实，从民族学对历史学的反思和补充，转为对现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变革的关注。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中，他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用访谈、理解和解读的方法，将考察结果文本化。在行文中，他不断强调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从建立事实入手，去建立理解当地社会的角度和立场，他用踏踏实实的考证工作构筑话语权，澄清了对当地部族具有争议的历史观点，对整个蒙古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都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

然而，S.巴达姆哈坦的学术价值并不止于此，他的民族志理论建构过程，自始至终关注着各民族部族在历史长河中千丝万缕的族源和文化关系问题，在这部民族志专著中，他为庞杂而凌乱的民族志材料赋予了一个民族学家的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² S.巴达姆哈坦用资料构筑了话语权，将图瓦人历史文化纳入蒙古国边疆社会的体制，间接证明了图瓦人与蒙古国的渊源关系，他认可早期俄苏的调查资料，却又反观他们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他的笔下，一个族群的生存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建构了蒙古国境内一个族群的历史，发出了一名具有民族精神的本土学者的声音。在他后来的研究中，遵循了通过对小部族的研究，从而阐述民族主体喀尔喀形成过程的研究步骤。1962年，S.巴达姆哈坦曾指出：“民族志研究工作继续发展的目标是，进一步为我国民族部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史搜集更多资料，并且尤其是尽量推广喀尔喀人中的民族志研究工作。”³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证族源的研究侧重点，他在七十年代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则进一步演变成对蒙古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反思，其学术思想也进一步趋向成熟。

¹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91页。

² 高丙中：《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培养扎实的民族志基本功》，《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第107页。

³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2页。



第二章 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以及在学术上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

第一节 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

1957-1998年，S.巴达姆哈坦在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从事研究工作，为蒙古国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民族学思想，一方面借鉴了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将游牧文明的价值与蒙古文化和思维特征相结合，他的学术贡献得到了蒙古国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界等的普遍肯定。在蒙古国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他首先在蒙古语语境下规范了民族学的术语表达，将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从对历史学的反思和补充，转向对现代背景下国家社会变革的关注，使民族学从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独立出来，使民族学从依附于历史学研究转向独立的学科领域。本节拟从他对民族学概念的界定、民族学研究对象与目的的观点入手，进而探讨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

(一) 西方和俄苏民族学概念引入蒙古

民族学基本概念是民族学界所讨论的热点话题，西方民族学的“族群”(ethnic group)理论与俄苏的“民族”(этнос)理论有许多相同和不同之处，西方学者、俄苏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学术话语不完全对应，导致民族学的基本概念涵盖的内容也不一致。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蒙古国民族学理论受到俄苏民族学学派的影响极深，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也成为蒙古国民族识别工作的主要依据。然而，蒙古国的民族学概念没有完全套用西方或俄苏民族学的定义及认知，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基本概念的反复定义，结合了不同历史时期蒙古社会的特点，是在蒙古语语境中创立的，他对民族学基本概念的的定义工作推进了蒙古国民族学的理论建设。

1. 学科术语的辨析

20世纪三十年代，蒙古国翻译家贡格尔扎布(Гонгоржав)将俄罗斯著名蒙古学家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译成蒙古语，在这部学术经典译著中俄苏民族学术语第一次被翻译到蒙古语语境中。译者将俄语的“народность”(意为：部族，少数民族，民族)译为“ястан”，将“племя”(阶级社会以前的部落；部族；<转，旧>民族)译为“аймаг”，将“род”(族，氏族，世系)译为“овог”¹。在此基础上，S.巴达姆哈坦把翻译语言由普通词汇提升为学术词汇，为蒙古国民族学学科确立了基本概念，并使用这些概念对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部族进行了辨析。他第一次用现代民族学理论，通过对喀尔喀蒙古语族(нийт монгол хэлтэн)的分析，将“部族(ястан)，种族(угсаатан)，民族(үндэстэн)”分别对应为“народность，этнос，нация”，他认为喀尔喀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种族/民族”(тусдаа угсаатан)，而是民族学理论发展形成的新概念——“族群”(бүлэг)。“氏族”(овог)是10—12世纪蒙古社会的基本单位，S.巴达姆哈坦对17-19世纪构成喀尔喀七旗的社会单位和亲属族群的称谓，避开以“氏族”(овог)命名，而使用了“овог аймаг”，“гөрлүүд”，“хөршийн хүй”，“их гэр бүл” патроними，“бичил хэсэг”，“орон нутгийн соёлын өвөрмөц хэсэг бүлгүүд”等称谓，在他的研究中，将中世纪的盟、氏族名称分为前代“дээд өвөг”和后代“удам угсаа”，他还指出，蒙古历史著作中将喀尔喀人习惯称为“ястан”，实为现代民族理论中的“族群”(угсаатны бүлэг)²。这是S.巴达姆哈坦基于社会主义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要求而做出的定义。

2. 对民族(үндэстэн)和种族(угсаатан)的甄别

种族和民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们共同体。种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尽管受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体质形态特征上，构成了人类的自然属性特征。种族之间

¹ A. 奥其尔：《哈坦先生是蒙古民族学创始人》，载于《民族研究》，乌兰巴托2004年，第171页。

² L. 毕力格图著：《S.巴达姆哈坦的喀尔喀部族研究遗产》，载于《民族研究》，乌兰巴托2004年，第22-23页。

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生物现象的区别,本身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民族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们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人们共同体。¹民族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自然科学的生物或物理概念,而是内涵十分复杂的具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含义且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复合型”概念。²

在各种语言词汇中出现的“民族”和“种族”实际上“反映了各种场景中产生的地方性‘身份认同’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相互交流。”³在蒙古语语境中的“民族”与“种族”甄别问题上,S.巴达姆哈坦认为蒙古国的民族成员是由同一具有共同种族起源的部族(нэг удам угсаагай ястнууд)组成的社会主义蒙古民族(МОНГОЛ ҮНДЭСТЭ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民族和种族问题虽然似乎有同一种理解,其实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民族是在具体历史时期,即封建社会灭亡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所产生的,民族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定义;而种族是自氏族公社时期开始,以氏族共同体(удас угсааны нийтлэг)为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继承了盟(аймаг)、部族(ястан)概念的社会概念。⁴他认为,民族和种族在理解上最根本的区别是:一、民族是资本主义市场与国内国际市场相联系的产物,而种族是在氏族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的概念;二、民族以独立为目标,是民族解放运动、政治领导力量的客观基础,而种族是以族源文化、语言集合为基础形成的;三、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所关注的内容是能够制定社会经济一体化,以及远景发展任务,而种族发展,是阐明各部族融合、同化,形成种族新的统一体(угсаатны шинэ нэгдэл)的过程。⁵

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和种族的定义和区分,显示了他对民族学研究对象的明确界定,他没有拘泥于斯大林“民族”定义⁶中四个特征的概念和束缚,而是从现代性角度讨论了实际生活中民族与种族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民族和种族的差别不仅存在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间,他认为,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在民族和种族问题上所体现的是各部族、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发生的新变革,他们之间相互融合、同化,形成新的民族团体,即现代种族的发展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与资本主义种族的发展有本质区别。⁷欧美各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始终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在处理白种人族裔的关系时,可以恪守他们所谓“文明社会”的准则,然而白种族群对待所谓“野蛮人”的关系,则把他们当作“非文明人类”来对待,不承认当地土著人自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则,只是靠武力和奴役来达到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目的。S.巴达姆哈坦一向主张批判资本主义的种族理论,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奴仆、为殖民主义所服务。

(二) S. 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的学科定位

从1957年开始,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族学调查工作,主要在各省和苏木创办研究所,收集、整理民族志,调查当地人的生活情况与民族特征,进一步为明确民族来源和划分民族成分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对婚礼习俗和民间服饰的考查等。1958年,S.巴达姆哈坦在《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一文中为民族学做出如下定义:“民族学是研究人的学问”,“民族学的

¹ 杨昌儒:《民族学纲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第165页。

²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4页。

³ 马戎,2001,《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第3页。

⁴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22页。

⁵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64页。

⁶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

⁷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22页。



诞生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相联系”¹，同时他把民族学研究看作对历史学的补充，他提出：“民族志研究是历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民族志研究，就不能正确认识和研究人民的历史。即使在文献史料中有人民历史和生活的记载，也是不充分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也反映了民族志研究是历史学所必不可少的内容。”²1962年，他总结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40年来的民族学研究经验，肯定了民族学在历史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他对民族学再次定义，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人民物质、精神文明历史，进而研究他们的起源、历史分布、居住习惯、血缘关系发展等问题的学科。”³20世纪六十年代左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民族学调查工作如火如荼，尤其侧重于对少数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进行调查和资料的搜集，S.巴达姆哈坦提出，“对文化遗产和物质文明的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新领域”，“民族学研究方面继续发展的目标是，进一步为我国民族部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史搜集更多资料，尤其尽量推广在喀尔喀人中的民族学研究工作。民族学专业人数稀缺，我们要通过增加各地民族学积极分子、记者等人数，收集更多民族学材料，在他们的帮助下，研究当地风俗以及现代人民生活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新变化，广泛收集物质文明资料的工作。”⁴

20世纪七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学研究，主要以现代民族学发展进程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社牧民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和确立进程为主，以此作为科学研究的方针。⁵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S.巴达姆哈坦在肯定马列主义学说和苏联经验的指导作用的同时，又提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问题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有“本质的独特性”：从民族构成角度来看，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部族间没有尖锐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建设也增进了他们之间在经济、文化、语言上的联系，使他们达到同一水平，是加强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同时各民族、部族的知识分子也成为发展民族部族文化的中坚力量。S.巴达姆哈坦还指出，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贯彻马列主义思想，是形成统一思想的社会主义民族的基本条件。总体来说，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学思想，淡化了民族的界限，主要强调各民族部族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1973年，S.巴达姆哈坦提出了“当前民族学研究的目标”，他说：民族学研究首先对于社会主义民族组成、众多部族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统一性和特殊性，以什么形式对社会主义统一文化形成影响进行研究，并对社会主义民族文化性质，传统与更新的问题，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进行跟踪研究，揭示其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主要包括三点要求：一、理论上应对蒙古各民族部族最初的组成以及几百年来历史更迭进行关注，对民族部族新共性产生的原因、不同民族部族之间产生的融合与渗透规律等问题提出理论判断；二、对蒙古民族传统物质和精神文化所包含的焦点、蒙古人对中亚文化繁荣做出的贡献，以及中亚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形态，其共性和特性进行研究；三、继续研究现代合作社牧民的经济，工人阶级在牧民社会、家庭经济与生活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确立中的角色，工人与合作社牧民的阶级关系，城市与牧区关系问题等，研究社会领导者、政策的制定者、主要劳动者有效而紧密的联系，重视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

¹ 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3页。

² S.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3页。

³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196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2页。

⁴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196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45页。

⁵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概述（1970-1980）》，198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14页。



的民族发展特征。¹他认为：民族问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民族关系，主要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种族）进程中社会发展的部族、民族经济、文化所发生的新变革，他们之间的融合进程（ижилсэх явц），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угсаатны шинэ нийтлэг），对逐渐确立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组成产生哪些影响等形式。

从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思想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对民族学的定位是从历史学的补充，慢慢走向学科独立的。

第二节 S. 巴达姆哈坦对蒙古民族形成的论证

蒙古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并不简单，国内外学者至今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蒙古民族经历了各民族部族间多方面、多层次关系发生的复杂过程，大部分蒙古国学者认为，原始蒙古人在蒙古民族的形成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论述喀尔喀蒙古人——作为蒙古民族主体组成部分的起源问题。S. 巴达姆哈坦对主体民族喀尔喀蒙古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喀尔喀部族是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共同体，是使蒙古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族群，他领导开展“三河计划”，通过寻找成吉思汗墓葬、发掘古代蒙古先汗与贵族的“宝地”，奠定了喀尔喀蒙古在整体蒙古民族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他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群也展开了详细调查和研究，通过对族群个案的研究，完成了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命题的论证。

（一）蒙古国境内民族分布情况概述

13 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了囊括东方和西方广阔疆土的蒙古帝国，15 世纪这个庞大的帝国又分成了许多小汗国。1921 年，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外蒙古爆发人民革命，苏联学者认为这是“蒙古人的觉醒，蒙古民族开始形成，并组成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家。”²然而在蒙古国学者看来，蒙古民族意识的形成，蒙古民族的形成不是经历过一场革命风暴骤然形成的，S. 巴达姆哈坦用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论证了蒙古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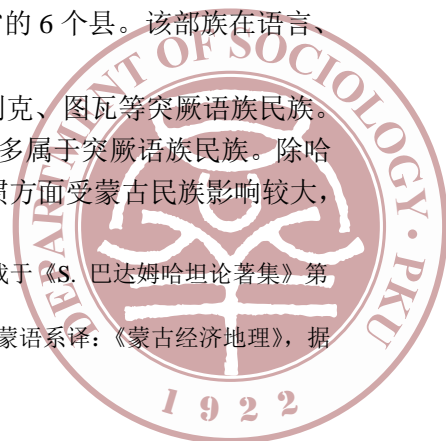
从民族构成上，蒙古国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蒙古民族主要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喀尔喀人、以及杜尔伯特、巴雅特、布里亚特、达里岗嘎、扎哈沁、乌梁海、达尔扈特、土尔扈特、额鲁特、明阿特、巴尔虎等部族和少数内蒙古人（察哈尔、乌珠穆沁等）构成。蒙古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语族的哈萨克人、和屯人、驯鹿人、图瓦人以及少数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华人。

喀尔喀人是蒙古民族构成中最大的部族，是蒙古国的主要人口，主要居住于蒙古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杜尔伯特、巴雅特、额鲁特、乌梁海、土尔扈特、扎哈沁、明阿特等部族属于历史上的卫拉特部。他们自古生活在贝加尔湖、色楞格河下游、唐努萨彦岭、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上游及阿尔泰丛林中。居住在蒙古国的这些部族，现今大多生活在蒙古国西部边疆省份。他们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喀尔喀人有一定区别，杜尔伯特人长期与和屯人、巴雅特人杂居生活，在各方面对他们有很大影响。而额鲁特人与扎哈沁、土尔扈特人长期杂居，从而彼此吸收各自的文化，他们的方言和风俗较为接近。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北部和东北部，即东方、肯特、色楞格、库斯古勒等省的十几个县。由于历史、地缘和人文环境的原因，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受俄罗斯文化和语言影响较多。巴尔虎人在语言、历史渊源、风俗习惯、分布地域上与布里亚特人较为接近。达里岗嘎人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南部苏赫巴托省的 6 个县。该部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喀尔喀人区别不大。

蒙古国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是哈萨克、和屯、驯鹿人、乌兹别克、图瓦等突厥语族民族。虽然和屯、乌梁海、驯鹿人、图瓦中也有属于蒙古部族的人口，但大多属于突厥语族民族。除哈萨克之外，其他各族人口均很少。现在，这些民族已在语言及风俗习惯方面受蒙古民族影响较大，

¹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概述（1970-1980）》，1982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118 页。

² [蒙] B. 贡嘎达希著，俄译者 A. B. 杜比宁、A. P. 林齐奈，辽宁外语专科学校俄蒙语系译：《蒙古经济地理》，据 1969 年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69 页。



只是在宗教信仰上有所不同。从地域分布上这些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蒙古西部省份。

(二) S. 巴达姆哈坦对蒙古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

蒙古国境内上古居民的民族起源和民族史、蒙古部族的形成，是蒙古国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对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一般要基于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对每个历史时期、不同群体、各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S. 巴达姆哈坦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群体之间如何区别、如何相互称呼、如何看待群体差异本质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血缘等各个维度，对于历史上持续发生在蒙古各民族部族之间的互动与融合，都进行了细致而具体的分析。

1. 对主体部族——喀尔喀的确认工作

S. 巴达姆哈坦在喀尔喀部族的民族学研究中指出：“现在，对我国诸族群的民族起源、民族志写作还没有被研究。这类研究先应从占我国人口 80% 的喀尔喀人开始进行，因为喀尔喀部族在蒙古人的历史上是蒙古氏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自 16 世纪下半叶始，在封建社会时期众多蒙古部族的确立进程中拥有特殊地位，同时喀尔喀文化也是全体蒙古氏族民族文化的集合，以上为喀尔喀部族民族学研究的缘起。”¹

S. 巴达姆哈坦明确提出喀尔喀部族是组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分，他从文献和田野调查的双重研究中，对喀尔喀的称谓来源、喀尔喀部族的形成、确立历史进行了梳理和考证。他将研究中所记录的氏族部落名称与喀尔喀内部的氏族血缘关系相联系，认为喀尔喀人在 18-19 世纪之间与邻族组成大家族，并沿用了早期蒙古人的主要姓氏，将他们的经济、物质与精神文化都作为民族文化统一体的构成因素。对于“喀尔喀”的称谓来源，S. 巴达姆哈坦认为，“喀尔喀”第一次出现于 14 世纪后半叶至 15 世纪初，即达延汗统治时期蒙古左翼六万户中的“喀尔喀万户”。关于“喀尔喀”的原始含义，他写道：“‘喀尔喀’一词有三个含义：一、山水地名（喀尔喀悬崖），二、人的脸颊，三、具有‘喀尔喀化’、‘喀尔喀’的含义。但这是否与氏族、血缘关系相联系，在《蒙古秘史》、《史集》等主要文献中没有定论，由此看来，一些学者认为‘喀尔喀’是氏族、联盟的名称一说，是值得怀疑的。”²他将喀尔喀的称谓来源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元朝灭亡后蒙古人回到原来地域，重新建立政权，称为“喀尔喀”；二、达延汗的九子格埒森札汗继承了父亲的领土和子民；三、喀尔喀万户在当时的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出现了“халх”、“халхавч”、“халх түшиг”、“харуул халх”等词汇。³在对喀尔喀部族的形态、确立的讨论中，S. 巴达姆哈坦持有这样的观点：喀尔喀作为地域和文化上的民族共同体并不是 16 世纪中叶才形成，而是民族觉醒、联合的过程，从喀尔喀万户到喀尔喀七部，再到更小的鄂托克单位，大多是 13 世纪成吉思汗时期的主要氏族部落。⁴

对于喀尔喀与当今蒙古国的关系，蒙古国学者和我国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蒙古国学者认为，喀尔喀就是蒙古民族的中心部分，从而证明蒙古国的历史就是蒙古民族的历史，为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寻找依据，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 800 周年庆典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论调。中国学者则认为，喀尔喀是 14 世纪后才出现的。达延汗时代，是蒙古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鉴于蒙古政治生活中长期出现的社会动荡局面，达延汗执政以后，决定进行社会改革，他在蒙古地区重新划分了六个万户，这六个万户又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和喀尔喀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蒙郭勒津万户和永谢布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大汗直接统治，右翼三

¹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民族志导言》，《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志》三卷本，第一卷，乌兰巴托 1987 年，第 4 页。

²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49 页。

³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50 页。

⁴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51 页。



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除了兀良哈外，达延汗把其余五个万户都封给自己的儿子领有，这就大大加强了大汗的封建集权地位。达延汗的五子阿尔苏博罗特和九子格呼森札共同领有喀尔喀万户。¹阿尔苏博罗特统率内喀尔喀五部，格呼森札领有外喀尔喀七部，外喀尔喀七部一直驻牧于哈刺和林一带，S.巴达姆哈坦在文章中所讨论的“喀尔喀部族确立过程”，实际为格呼森札从达延汗手中继承的统治区域，他认为喀尔喀部族的确立基础是自16世纪中叶以来，格呼森札及其子孙喀尔喀七部和喀尔喀三部汗，这为喀尔喀部族的成立打下了地域、经济、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基础。17-20世纪之间，喀尔喀部族又具有了封建社会的民族特征，形成了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文化共同体。²S.巴达姆哈坦对喀尔喀部族集体性身份认同的论证，是将族群的、文化的因素与社会阶级认同的历史阶段性相联系而形成的，因为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历史时期，阶级身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认同身份。³他进一步指出，促成喀尔喀部族形成的条件主要有三个：“喀尔喀蒙古”在全体喀尔喀人的意识中形成了地域统一的概念；喀尔喀地区有统一的经济、物质与精神文化；为了国家的独立解放，封建社会时期诞生的国家观念变成了民族统一紧密团结的观念。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比较来看，S.巴达姆哈坦也将族群认同纳入领土、经济、文化范畴，但他尤其强调了喀尔喀部族确立的政治含义，通过政治上的民族认同加强了国家及其机构的社会基础，将其视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族群。

3. 对少数民族群的确认工作

除了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以外，S.巴达姆哈坦对蒙古国境内许多民族部族都进行过详细研究，这些个案研究，与《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共同构成了对“蒙古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命题的论证。其中包括《库斯古勒省驯鹿人（乌梁海人）的起源问题》（1960年）、《关于阿尔泰乌梁海的婚姻习俗》（1960年）、《乌布苏省的和屯部族》（1990年）、《卫拉特民族的族源历史概述》（1993年）、《明阿特部族情况》（1993年）等。蒙古国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群是哈萨克、和屯、驯鹿人、乌兹别克、图瓦等突厥语族民族，他们是蒙古国境内众多民族部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确立蒙古民族构成问题，S.巴达姆哈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结果，从氏族起源、物质和精神文化等角度指出了蒙古民族文化存在的联系与共性，理解和分析蒙古国境内的族群历史、族群现象和族群界限。下文拟从蒙古国境内的驯鹿人研究入手，分析评价S.巴达姆哈坦在蒙古国少数民族群确认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在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人、驯鹿人中间开展了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不仅收集了达尔扈特人、驯鹿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总体资料，还关注了氏族起源、氏族称谓、社会经济、游牧类型等问题。驯鹿人居住在蒙古国库斯古勒省的北部边境地带，在《蒙古秘史》和《史集》中称为“唐努乌梁海”和“萨彦乌梁海”，驯鹿人自称为乌梁海部族的畏兀尔（*урианхай угсааны уйгар*）。根据1935年统计，驯鹿人有40户人家、300余人口，1958-1959年减少为200余人口，他们饲养有400头左右驯鹿，其中主要生活在大森林中从事驯鹿业生产的人数仅为30余户人家，120余人口。在1956年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包括对驯鹿人地区的统计。1956年后，当地人自愿成为蒙古国公民，开始投身于所隶属的苏木公社生产生活中，这使从事驯鹿业生产的人更为减少，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数逐渐增加。驯鹿人的族源与图瓦自治省（*Тува муж*）人口众多的托金人有密切联系，S.巴达姆哈坦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结论，对俄苏学者的观点做出判断：苏联学者近几年所做的田野调查，认为图瓦西部和中部人口，大部分保存着中亚传统，但东部驯鹿人则体现了贝加尔湖的特征。

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也赞同将驯鹿人分为两部分的观点。他记录了库斯

¹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68—70页。

²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69页。

³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古勒省驯鹿人的体貌特征¹，用自然科学为依据证明了驯鹿人的血统中加入了蒙古化的氏族与民族联盟。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林木中百姓在成吉思汗时代被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在随后的700年间，其语言和文化发生了蒙古化，由此看来，苏联学者认为图瓦人在体貌特征上的变化很小的猜测是错误的。按苏联考古学家捷别茨（Г. Ф. Дебец）的分类，图瓦人的体貌特征属于萨彦特征（Сияны хэв шинж），他们不是源自同一个血统（种族），而是融入了曾居住在欧洲、亚洲的古代先民的血统。图瓦人通常被看作是西伯利亚突厥人的一支，然而和蒙古地区文化与历史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变得复杂。有些分析家认为，俄国和苏维埃时期的历史记载故意地忽略图瓦和蒙古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作为俄国对这一地区提出主权要求的根据。然而，在事实上，作为16世纪以来各方竞相争逐的领土上的居民，图瓦人同时从突厥语族的吉尔吉斯人和蒙古的卫拉特人那里获取了文化的和遗传的基因特征。²由于驯鹿人与图瓦自治省的血统渊源关系，S.巴达姆哈坦对图瓦复杂的民族成分之论证，涉及了跨境民族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他们是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蒙古国也可以称作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

4. 蒙日联合“三河计划”

蒙古国民族学界一般认为，三河流域的蒙古居民在蒙古民族起源和语言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三河流域蒙古人始终是形成的统一蒙古民族共同体最稳定的核心。³现代喀尔喀人基本上与现代三河流域蒙古人的族源相同，他们继承了三河流域蒙古人的基本地域，随着三河蒙古人附近蒙古语部族的并入，以及突厥语族部落也发生同化，加强了地域统一和部族的集聚。蒙古国学者利用他们的民间口头传说和文献史料研究三河流域蒙古人，就是为了证明古代喀尔喀蒙古就是古代蒙古的核心——三河蒙古人的后裔，以此确立喀尔喀蒙古在整体蒙古民族中的核心地位，有利于蒙古国家意识形态的树立。

“三河计划”是蒙古国与日本联合提出的研究课题，具体实施于1990-1993年，主要目的在于寻找成吉思汗的陵墓，S.巴达姆哈坦是蒙古国一方的学术领导者，田野调查部门负责人。他很早便对该问题产生了兴趣，1985-1989年，他成立了“10-15世纪三河蒙古人的起源，历史，文化”研究部门，为孛儿只斤、泰赤兀等部族地域的详细确立、为寻找他们的墓葬工作，做了重要前期工作。其间，他在三河流域五次成立了考古学、民族学联合调查田野机构，推行了一些发掘工作，他结合其工作导师呼·普日来的观点，亲自勘察《蒙古秘史》中出现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地区，多次进行详细研究。1988年，他开始论证“三河计划”课题，在技术、交通、参与人员方面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90年开始执行。“三河计划”课题对三河流域地区做了一次历史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考察，发掘了蒙古帝国时期的25座墓葬。S.巴达姆哈坦用这项研究成果证明了蒙古先汗、贵族埋葬之“宝地”，埋葬圣主成吉思汗的“秘密之地”，位于肯特汗乌拉山盆地的推测。⁴蒙古国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家从未间断对成吉思汗墓葬地点以及三河流域蒙古人的研究，蒙古国科学院院士呼·普日来早在契丹古城的考古发掘中就曾提出，室韦和三河蒙古具有直接遗传亲缘。三河流域的那部分蒙古人又衍生出一些与其亲近的氏族部落集团，构成了古代蒙古部族的核心。D.贡格尔、Sh.纳楚克道尔基也都曾经论述过，远古时候定居在鄂嫩河、克鲁伦

¹ “库斯古勒省的驯鹿人拥有宽阔的脸庞，头部短胖，眼部呈线性，小，眨眼频繁（аньсага хөгжсөн），直直的鼻子，鼻梁矮，嘴脸高，鼻翅宽，颧骨宽并隆起，粗而黑的直发，肤色为黄色、淡黄色、黄褐色、褐棕色，体毛稀疏，平均身高为男性158-162厘米，女性平均身高为153-155厘米。”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驯鹿人（乌拉海）族源问题》，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1页。

² [俄]斯蒂凡·苏利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内的民族关系》，载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第256页。

³ [苏]X. Ц. 拉拉丁 Г. Г. 斯特拉塔诺维奇：《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载于《世界民族》1980年第6期，第30页。

⁴ D. 策旺道尔基（Цэвээндорж）：《S. 巴达姆哈坦与蒙日联合“三河计划”》，载于《民族学研究》，乌兰巴托，2004年，第20页。



河和土拉河谷地上的蒙古语族部落是喀尔喀部族的核心。可以说 S. 巴达姆哈坦领导的“三河计划”继承了蒙古国民族学、历史学的学术传统。

第三节 S. 巴达姆哈坦对蒙古民族族群关系的分析

S. 巴达姆哈坦不但对蒙古民族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考证，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民族关系的产生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他运用了人口普查数据，着重分析了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问题，并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梳理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民族在认同方面的变化。

(一) S. 巴达姆哈坦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工作

民族识别不仅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一项严肃而又艰巨的科学工作。这是由“民族”这一概念本身的科学规定性，以及民族形成、发展、演变的长期性、复杂性所决定的。民族的产生、发展、演变、消亡，以及包括作为“民族”这个特殊的共同体所应具备的条件等，都属于民族学研究范围。民族识别无疑是属于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项集社会实践性与科学性为一身的民族识别任务，历史地落在了蒙古国民族学工作者的肩上。

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家对科布多、乌布苏、东方、苏赫巴托、南戈壁省等地区进行了民族学调查，S. 巴达姆哈坦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民族学研究中，这对民族学调查方法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他曾提出，调查时要注意当地民族部族的分布，绘制地图；与访谈对象对话时，要对当地人的来源、原因、谁属于哪个部族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也要清楚地知道访谈对象的内心想法；与访谈对象谈话时最好能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评价。比如“本地区居民（族群、民族）对自己及该地区的命名”问题，“邻近的居民对此如何称呼”问题，“该地区的居民对邻近地区的民族如何称呼，其中有哪些内容涉及自身起源问题”，“该地区人群自认为隶属于哪个部族。访谈对象自己曾属于哪个氏族，氏族名称”问题等¹。这都是民族划分工作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另外，在 1958 年蒙古—捷克合作组织的人类学调查工作中，S. 巴达姆哈坦认为，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方法对氏族联系（尤其是分散独立居住的部族之间）的确定也有一定帮助²。

S. 巴达姆哈坦通过对 1956-1963 年的人口普查与民族识别结果对比分析，指出了在当时蒙古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民族认同变化。他注意到，1956 年人口组成中共有 23 个部族，而 1969 年的人口构成中只剩 10 个部族。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总数却由 84.55 万升至 120 万。根据 1969 年的统计结果，以撒尔都拉、辉特、阿巴嘎、浩济特、哈莫尼干命名的部族已经几乎消失，乌梁海的人数较 1959 年有所减少。对此现象，他认为，这是以蒙古民族重要组成部分—喀尔喀语言文化为基础，确立社会主义蒙古民族国家民族一体化的明证。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时期的部族组成中有喀尔喀、杜尔伯特、巴雅特、土尔扈特、明阿特、布里亚特、达里岗嘎等具有人口规模的部族，这些部族从封建社会开始以民族独立统一的形式产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点。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政策对现代社会主义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产生了作用，同时各部族的方言和独特文化也被民众意识所吸收。在有些地区，民众的不再发自身氏族名称为“姓氏”，而以新的民族一体化之名称作为“姓氏”的称谓。³其原因是，人民革命胜利后，扎布汗省一些苏木中有许多居民为了区分自己与喀尔喀人，自称为撒尔都拉人，然而后来又自愿改称为喀尔喀人，在巴尔虎、喀喇沁、达里岗嘎等部族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是在西蒙古杜尔伯特、巴雅特、扎哈沁

¹ S. 巴达姆哈坦：《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1958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 页。

² S. 巴达姆哈坦：《1958 年所做的人类学调查工作》，1959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17 页。

³ “例如：在库斯古勒省、扎布汗省一些苏木中，辉特人占人口比例最大。1956 年为 1368 人，然而 1963 年仅变成 151 人，而喀尔喀人占该部族人口比重的 99%。”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5 页。



额鲁特、明阿特、土尔扈特等部族中，仍然普遍存在着依据氏族起源为姓氏的传统说法。¹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自我认同变化的研究，证明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民众意识中发生的民族一体化思想。

（二）新型民族关系的产生

通常来讲，衡量民族关系有以下几个变量：1. 文化，尤其是语言宗教的文化差异；2. 社会交往或社会结构的相互进入（实质性的渗入）；3. 通婚；4. 族群意识；5. 偏见；6. 歧视；7. 观念与权力冲突。² S. 巴达姆哈坦通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对蒙古现代民族的形成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产生了新型民族关系，其中包括族际通婚、民族融合与同化现象以及各民族部族在文化方面形成意识形态的统一。

1. 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能够深刻地反映族群关系深层次的状况，这是因为族群之间的基本差异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观念之中，从而使人们把周围的人群区分为“同族”与“异族”两类。每个人只有对另一个人在感情和心理上都认为“可以接受”和感到十分亲近的时候，才有可能考虑到与他（她）缔结婚姻的问题。两族成员之间的通婚愿望，是得到本族人群体的支持还是反对，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体现两族关系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当两个民族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达到一致或者高度和谐，两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社会交往，他们之间才有可能出现较大数量的通婚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族际通婚是民族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³

S. 巴达姆哈坦根据 1969 年人口调查材料，对乔巴山省 19 个部族代表，共 1718 户家庭（没有丈夫或妻子的家庭排除在外）进行统计如下：喀尔喀—喀尔喀为 69%，喀尔喀—布里亚特 2%，布里亚特—布里亚特 59%，布里亚特—喀尔喀 41.2%，巴尔虎—喀尔喀 1%，达里岗嘎—喀尔喀 2%，同时杜尔伯特—喀尔喀，明嘎特—喀尔喀，额鲁特—喀尔喀，乌梁海—喀尔喀，达尔哈特—喀尔喀，扎哈沁—喀尔喀等部族间也有通婚。从该指标中，未能与同族女性结为夫妻，而与异族女性组成家庭的情况来看，喀尔喀 4.7%，布里亚特 2.6%，巴尔虎 1.7%，乌珠穆沁 1.6%，达里岗嘎，杜尔伯特，达尔哈特，扎哈沁。

以科布多省为例来看（共 1022 户家庭，14 个部族），喀尔喀—喀尔喀 50.8%，喀尔喀—扎哈沁 2.5%，喀尔喀—明嘎特 1%，扎哈沁—喀尔喀 2.5%，扎哈沁—扎哈沁 9.1%，明嘎特—明嘎特 3.7%，土尔扈特—土尔扈特 1%，哈萨克—哈萨克 9.7%，除此以外，喀尔喀—杜尔伯特，喀尔喀—明嘎特，喀尔喀—土尔扈特，喀尔喀—巴雅特，明嘎特—喀尔喀，明嘎特—扎哈沁，土尔扈特—喀尔喀，土尔扈特—扎哈沁，土尔扈特—额鲁特，乌梁海—喀尔喀，哈萨克—乌孜别克，哈萨克—额鲁特，巴雅特—额鲁特，和屯—杜尔伯特部族间也有通婚情况。与其他部族女性组成家庭的有：扎哈沁 10.2%，额鲁特 7.0%，喀尔喀 5.1%，明嘎特 2.4%，土尔扈特，乌梁海，哈萨克，乌孜别克，杜尔伯特 1.5%。⁴

在 S. 巴达姆哈坦看来，族际通婚体现了民族一体化中产生的新现象：人们的观念中遵循氏族、亲族、民族的观念逐渐消失，在亲族和民族的立场上互相视为异乡人，而产生仇视和怀疑的现象也不复存在，外来人口来到当地城市，与当地居民在风俗习惯上已经没有区别，逐渐自认为属于该城市，表现出同一城市统一思想，在组成家庭时，部族关系并不重要，在家庭中子女的族

¹ “例如：1956 年杜尔伯特人口 2.56 万，土尔扈特人口 0.47 万，1963 年时杜尔伯特人口为 3 万，而土尔扈特人口达到 0.6 万。”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5 页。

²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第 55 页。

³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第 166 页。

⁴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 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属按父亲的部族或当地主要居民部族的情况几乎占了 100%，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民族种族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¹

这些人口统计数据，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S.巴达姆哈坦利用人口普查材料，从统计学意义上对蒙古民族一体化做出了有力论证。

2. 民族融合（харилцан ижилсэх）与同化（нийлэх）现象

通过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S.巴达姆哈坦注意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部族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现象，“如果说融合现象发生在同一民族或部族，那么同化现象则主要发生于不同民族或部族中”。²民族同化表现在“两个不同族源的部族共同生活几百年，一个接受了另一个的语言、文化，却保留了自身部族的意识观念。”³在民族融合和同化现象深处，反映了民族意识与族群关系下的民族认同问题。在 S.巴达姆哈坦看来，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喀尔喀、哈萨克部族语言文化的发展为依托，其他部族与这两个部族发生融合、同化，逐渐形成两个基本民族共同体，其一：由杜尔伯特、巴雅特、额鲁特、扎哈沁、土尔扈特构成的共同体，其二：由喀尔喀及其所包含的族群构成的共同体。对 S.巴达姆哈坦提出的两个民族共同体，需要结合当时蒙古历史与当时整个蒙古历史来理解。这两个民族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东西蒙古，只是西蒙古加入了突厥语族的成分。在 14-17 世纪，一直发生着东西蒙古争取蒙古正统汗权的斗争，而东西蒙古在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时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了重新组合，S.巴达姆哈坦对两个民族共同体的论述，表达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西蒙古之间的斗争已经被新型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所取代。

3. 文化与族群的关系

S.巴达姆哈坦对文化与族群关系的论述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将传统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意识形成的核心，认为民间文化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精英文化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利器；二、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蒙古国各民族部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和方针的指导下，发展蒙古国民族部族的关系，目的在于消除政治、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情况，统一各民族部族的意识形态，共同促进与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对喀尔喀部族文化进行探讨时，他将蒙古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外来文化”和“黄教”区分开来，他认为尤其在 20 世纪初，“喀尔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虽然处在外来侵略者的压迫之下，条件非常严峻，但是保护创造历史的民族，发展文化的愿望，对于有创造力的劳动力，与东方其他受到压迫的民族一样，巩固了民族统一，发展了传统文化”⁴。在他看来，喀尔喀部族文化“成为全体人民民族意识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了民族独立而战斗思想的主要武器”⁵。

20 世纪七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主要以合作社牧民生活、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形成的进程作为主要研究目标。S.巴达姆哈坦认为，现代民族进程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在族群间推行氏族文化现象。古代各族群拥有各自的方言、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人民革命年间，尤其是畜牧业合作社化活动胜利后，人民个体户占第一位，成为牧民，在此后二十年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业主要阶级合作社员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民族文化发展进程，

2005 年，第 122-124 页。

¹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122-124 页。

²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5 页。

³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 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65 页。

⁴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46 页。

⁵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247 页。



迈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¹

S. 巴达姆哈坦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民族关系，具有本质的独特性，“首先，我国有90%的人口属于蒙古民族，既有统一民族，也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化，因此民族问题并不尖锐也并不错综复杂。在人民革命年间，哈萨克、乌梁海、和屯等少数部族的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卓有成效，他们已成为社会主义蒙古民族家庭的平等成员。”²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推行了民族平等政策，以少数民族群为对象进行了制度性安排。举例来说，1940年，根据哈萨克、乌梁海人民的传统聚居区建立了巴彦乌列盖省，在该省成立了少数民族省党委、行政机构，由民族代表组成苏木、公社等。在少数民族群的教育方面，全省共有24所学校，出版了使用民族语言和文字刊行的省刊《新生活报》以及各种文艺书籍；在社会经济方面，巴彦乌列盖省成为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大省之一。S. 巴达姆哈坦认为：“这些并没有使部族间的意识关系更加尖锐，而是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语言上的联系，使它们达到同一水平，是拉近他们彼此关系的有利条件。”³他意识到这些制度性安排的积极作用，这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群成员利益的有效保障，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他赞成各民族部族知识分子视作对发展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提倡对多元民族文化的弘扬。⁴其实，S. 巴达姆哈坦强调弘扬多元民族文化，实际上是站在全体蒙古国人民保持“政治一体”的立场上所提出的观点。S. 巴达姆哈坦在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上指出：“全蒙古民族文化的形成是各地缘蒙古人分支、蒙古人的各民族集团以及非蒙古起源的各小民族在文化上互相作用和相互丰富的结果。语言发展过程和民族自我意识性质上的变化，标志着在蒙古社会主义民族形成过程中，地缘蒙古人分支在进一步聚合，并发生融合。方言正在消除，全蒙古标准语正在喀尔喀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原先那些地缘部落名称——它们只是作为一种残余或作为一种对其历史的回忆而存在于各民族集团代表人物的记忆之中——的作用的降低，说明在民族自我意识上正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一种属于蒙古社会主义民族的意识正在巩固。还可以看到小的民族共同体同较大的民族共同体融合的过程。”

第四节 S. 巴达姆哈坦在学术上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

“民族国家”是一种新的群体认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一类族群和身份认同。由于“民族主义”的兴起，人类群体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统一成为某种新的共同体，所以出现了“民族”（nation）的概念。⁵“民族”根植于政治的领域，任何民族主义思潮都具有基本的政治诉求，并且与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紧密相连。作为一名民族学家，S. 巴达姆哈坦从学术资源上为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依据，他论证了多层次蒙古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探讨了近代蒙古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民族统一带来的影响，将蒙古民族的历史置于20世纪初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完成了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学术建构。

（一）多层次系统的蒙古族群认同意识

“从部落到国家，民族意识在多层次系统的族群认同体系中，在人们心目中与行为中最核心、最重要的”⁶，S. 巴达姆哈坦对喀尔喀部族形成的论证中，梳理了民族意识形成与巩固的两个层级：

¹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20页。

²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62页。

³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63页。

⁴ S. 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种族的发展问题》，1973年，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63页。

⁵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570页。

⁶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0页。



以血缘传承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部族和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¹。他认为，“民族意识与族群关系的概念是自人类产生以来的传统社会现象，而在完成社会主义民族一体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消失，这个概念仅遗留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²“这个概念”便是民族部族认同与血缘家族认同的意识。

17世纪三十年代，漠南蒙古各部完全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喀尔喀三汗开始考虑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彼此协调，并联合卫拉特各部以防来自清朝的军事压力。清朝把蒙古地区划分为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两部分，外藩蒙古又有外札萨克蒙古和内札萨克蒙古之别。1688年，喀尔喀归顺清朝，属于外札萨克³。1691年的多伦诺尔会盟完全改变了喀尔喀三汗所分别统治的独立政治体制，增设札萨克，编审旗分和佐领，加强了对喀尔喀的统治，巩固了北部边防。⁴盟和旗本不是蒙古部所沿用的传统社会政治军事体制，而是应清朝对蒙古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新体制，在S.巴达姆哈坦看来，继格呼森扎统领喀尔喀万户以来，蒙古部落历来沿用的亲族联盟体制就逐渐被地域联盟的新体制所取代，“鄂托克”、“万户”、“旗”成为封建统治的稳定团体，促进了蒙古诸民族部族的联合，从而萌生了“统一全体蒙古民族”的“封建国家意识”。⁵

S.巴达姆哈坦认为，喀尔喀部族在17-20世纪之间完成了由内部氏族血缘关系认同到形成民族文化统一体的转变，拥有地域、经济、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基础，具有封建社会的民族特征，由此形成了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文化共同体。这种认同意识的改变，明确和强化了以喀尔喀为代表的蒙古族群的边界，能够“推动以族群为单位的集体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行为”，民族与血缘并不一定有自然意义上的直接联系，但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核心。S.巴达姆哈坦针对血缘氏族关系认同和封建国家意识认同的理解，提出了这两个层级认同的复杂性，认为喀尔喀政权虽然具有军事性质，和屯阿寅勒在社会和家庭范围内依然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关系，依据氏族和家族划分族群的传统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他认为喀尔喀人是古代蒙古人血统中的主要氏族，血缘关系是民族意识逐渐形成的重要力量；喀尔喀地区也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汗国的发源地，是蒙古人在历史上、政治上的“故乡（祖国）”，为民族统一提供了客观条件；他将18-20世纪喀尔喀对抗清朝的战争，看作“为民族国家独立而开展的喀尔喀人民解放运动”⁶，这种观点为民族认同赋予了政治功能，为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合法性。

（二）对蒙古民族工业兴起的研究

“19世纪下半叶，西方英法国家发动了‘鸦片战争’，战胜了清朝，加强了对中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统治，在当地任意区域开展自由贸易，从此，蒙古地区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的注意。”⁷用1840年鸦片战争来划分资本主义市场对蒙古地区的影响研究并不多见，而S.巴达姆哈坦在他的民族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探讨蒙古民族形成过程中提到这个重要因素，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S.巴达姆哈坦认为，鸦片战争使蒙古地区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趋势，对喀尔喀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与蒙古国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

蒙古民族的传统社会经济主要是一种畜牧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家庭手工业主要为畜牧业生产、生活服务，生产原料是现成的皮毛、奶类等畜产品，经过加工后供自家消费，或被迫提供给封建统治阶级享用。鸦片战争前，蒙古的商品市场尚未被外人打开，手工业规模小

¹ 在这里要注意中国学者与蒙古国学者对蒙古民族历史和蒙古国历史的不同看法。——笔者。

² S.巴达姆哈坦：《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发展进程》，1982年，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三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123页。

³ “外札萨克盟无兵权，并受当地将军或办事大臣及参赞大臣节制。”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347页。

⁴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252页。

⁵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60页。

⁶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69页。

⁷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46页。



而且分散，在整个蒙古地区的经济生产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学者一般认为，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外国产品虽然仍没有完全打开蒙古市场，“但是，外国产品的冲击对蒙古幼稚的手工业部门的存在和发展，打击同样是沉重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廉价的工业产品，摧毁了我国包括蒙古地区在内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使蒙古和内地一起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¹在这个问题上，S.巴达姆哈坦站在蒙古国民族学家的立场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重点关注了蒙古地区原有的传统民族工业如何蜕变为现代工业的问题。

他认为，虽然19世纪中期，达尔扈特部族的手工业还未从畜牧业生产中脱离出来，具有辅助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性质，然而各种手工制品的生产已经逐渐以工业化生产为主。²在喀尔喀蒙古地区更是出现了种植业、手工业³、工艺品制造业⁴独立发展的倾向，“这成为当时新的、觉醒的、进步的事情”⁵。他不仅仅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来解释工艺品制造业的发展，更认为它具有“宗教和民间艺术形式独立的生产形态”。同时，他提出喀尔喀大库伦寺庙成为当地内外贸易中心，蒙古民族内部市场的发展特别为喀尔喀部族的统一带来了质变的新趋势。⁶

19世纪末，除官办企业外，蒙古还没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工业，只是在俄罗斯与清朝边境城镇有一些俄商经营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工厂。这些工场一般规模不大，利用当地劳动力进行畜产品加工，生产出的成品或半成品就地销售或运往俄国。俄国工商业者在蒙古投资厂的目的，并不是要将蒙古的封建经济变成资本主义，他们所关心的是掠夺蒙古的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对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毫无助益，中国学者把这种经济类型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手工业经济”。⁷然而，在S.巴达姆哈坦看来，蒙古地区的商业具有繁荣的局面：大库伦、乌里雅苏台、彻辰汗盟的孛儿只斤将军贝勒旗西、东乔日、三音诺颜汗盟的达赖却音霍尔王旗等喀尔喀众旗、库伦寺庙，都出现了专门培训宗教艺术的手工业短期学校，对有天赋的年轻手工业者进行教育，同时，制作民间生活必需品、畜牧业产品的马鞍匠人、家庭木匠、制帽者、制靴者、打铁匠等人都集中在库伦寺庙和牧区，辅助畜牧业工作。不仅如此，在牧区例如库斯古勒省达尔汗旗等地区，出现了生产手工艺品的定居匠人。⁸其实，外蒙古的手工业主要分布在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几个重要城镇，民族工业兴起的现象并不普遍，但是S.巴达姆哈坦将其纳入工业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强调手工业发展中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用这一独特性形成了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

（三）S.巴达姆哈坦眼中的“民族解放运动”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运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具有“单一政权与官僚制度”的“一块容易得到认同的领土及地域”，享有“一个共同起源的神话与历史”以及其他诸如语言和肤色等文化特征的人群，一个作为民族主义思想中坚城市知识分子阶层。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土基础主要是由殖民政权提供的。⁹以领土为基础，以推翻殖民政权为目的的运动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由此看来，以S.巴达姆哈坦为代表的蒙古国民族学家，将17世纪以来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至20世纪初外蒙古地区独立的200年间历史，视为“内受封建压迫，外受殖民统治

¹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28—129页。

² S.巴达姆哈坦：《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乌兰巴托2002年出版，第123页。

³ 家庭必需品、服饰、帽子、靴子等

⁴ 金、银、铁艺、制作佛像工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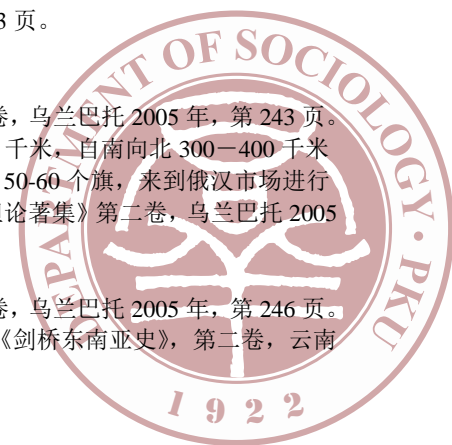
⁵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43页。

⁶ “仅对大库伦来说，根据历史学家Ц.Насанбалжир的研究来看，东西300—600千米，自南向北300—400千米的地区，是喀尔喀中心，在东西40余个旗内部形成了贸易市场中心，喀尔喀50-60个旗，来到俄汉市场进行贸易活动。”S.巴达姆哈坦著：《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45页。

⁷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39页。

⁸ S.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年，第246页。

⁹ [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胡华生、牛振明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10页。



的最艰难时期”，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称作“一个为国家地区独立觉醒，为民族发展扩大而斗争的时代”。¹世界进入 20 世纪以后，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²S.巴达姆哈坦认为，“由于蒙古地区被帝国主义国家视为竞争之地，高涨的反抗清朝运动演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新特点使该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³

S.巴达姆哈坦对蒙古地区的历史研究，完全体现了“民族主义中的建国愿望”，他将源自血缘氏族民族意识认同转化为“民族意识”，力图在学术研究层面，为蒙古国（当时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新的政治实体，塑造“以喀尔喀人为主体的‘蒙古民族’意识”，论证独立的“蒙古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的合法性。以喀尔喀人为主体的蒙古民族，不但有自己的文化特征，也具备相对固定和公认的集中居住地（“领土”），其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各国蒙古学家所关注的焦点。S.巴达姆哈坦通过毕生努力，从历史、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论证了蒙古民族的“族群特征”，并对其赋予了潜在的政治含义，在对蒙古民族发展历史的写作中，逐步完成了一个民族学家对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

结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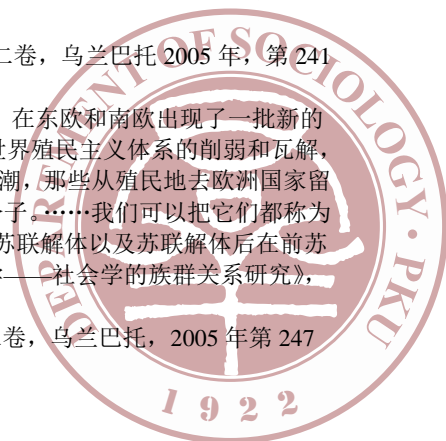
S. 巴达姆哈坦先生是蒙古国最重要的民族学家之一。自留学苏联以来，他的学术思想不断在蒙古国内外的学术界传播，成为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民族学家。他在蒙古国民族研究实践和民族学学科建设事业中，为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他的学术事业从民族学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开始，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从书斋中汲取知识，而注重实地考察，力求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社会的全貌，这是将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可贵尝试。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学本身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S.巴达姆哈坦积极参与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的实地调查，不但对蒙古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蒙古国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一名民族学家，他积极投身于政府边疆建设部门的筹建工作，于 1972-1977 年间担任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中央委员第二秘书长；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大呼拉尔第八次选举中，当选为库斯古勒省人民大呼拉尔代表；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七次大呼拉尔中，当选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S. 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学的重视，可以说是对蒙古国现实社会迫切需求的关怀，在他毕生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他为祖国的命运殚精竭虑，毫无保留。对于 S. 巴达姆哈坦民族学思想的界定，我认为，他在学术上对“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其民族学思想的核心。他的民族志书写，为这一思想提供了最佳注脚。

S. 巴达姆哈坦在苏联的留学经历，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定型时期。他最关怀的是如何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建构，以及蒙古国境内各民族部族如何面临现代文明挑战的问题。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解边疆民族的情况成为蒙古政府当局的迫切需要，S. 巴达姆哈坦凭借一名民族学家的职业精神，深入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严格按照田野调查的要求，把各少数民族群

¹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 2005 年，第 241 页。

²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第二次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那些从殖民地去欧洲国家留学的人员和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成员成为推动本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分子。……我们可以把它们都称为第三类即‘解放型’的‘民族—国家’。……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 90 年代苏联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前苏联各个地区和一些东欧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分裂运动。”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第一版，第 573—574 页。

³ S. 巴达姆哈坦：《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载于《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第二卷，乌兰巴托，2005 年第 247 页。



的民族志纳入特定的时空坐标。他既是田野调查者，又是民族志的作者、民族学理论的探索者，他在民族志写作中（以《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为例），不仅能够通过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力求“完成‘解释的解释’和描写民俗生活的生态和民俗传承”¹，而且逐步在民族形成、民族关系、游牧文明的传统与变迁、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等方面，完成了一名民族学家在学术上对“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蒙古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过程中，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具有奠基性意义和深远的作用，笔者通过对其进行整理，可以得出以下思路：

一、民族起源与民族关系

蒙古国境内的民族构成，实际上包含了历史经验非常不同的多民族来源，S.巴达姆哈坦用田野调查资料作为对文献史料的补充和佐证，深入了解了这些复杂的多民族起源问题，力图澄清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不同方式，被整合到“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研究中，他强调将历史、经济、文化等因素相结合，探讨了诸民族部族如何在“统一国家”的权威下，保持自身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问题。S.巴达姆哈坦在关注各个民族志写作个案的同时，又将蒙古国境内民族部族的氏族起源、物质和精神文化等作为完整的集合体，以阐述各族群之间的渊源与交往关系，证明了跨境民族是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论证了蒙古国是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的命题。

“民族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政治统一，而政治的统一则倾向于同社会的统一融为一体。解决传统民族差别问题的习惯方式是同化或涵化，另一种解释传统民族差别的方式是发展多元形式。”²S.巴达姆哈坦对民族关系现状开展研究时，除了理清古代蒙古史上不同民族部族的族源关系问题，更侧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多民族、多部族文化如何被吸纳到小民族共同体，小民族共同体（达尔扈特人、驯鹿人、和屯人等）又如何融入大民族共同体（喀尔喀蒙古人）的过程。他将这些民族部族的文化层次置于不断更新的动态之中，提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产生了新型民族关系：蒙古国的民族在古代确立的关系格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重新组合，同时一个以喀尔喀部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完全形成。

多年来，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方面，比较注重对某个少数民族的单位研究，相比之下，S.巴达姆哈坦的民族学思想却更侧重于民族关系的相互影响研究，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二、传统民族意识与现代民族认同

“在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这两个层次之间，人们的意识甚至需要有某种断裂带似的跳跃，而不一定是简单的过渡。从传统民族意识进到高一层的现代民族意识，不完全是量的积累过程，而可能需要某种质的飞跃。”³S.巴达姆哈坦有意识地对蒙古国民族的主体——喀尔喀共同体的形成进行历史性论证，并结合17—20世纪以来的喀尔喀历史，在反复论证中完成了民族意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形成过程。他明确提出，喀尔喀部族是组成蒙古民族（这里的蒙古民族应该指蒙古国的民族，而不是包括中国内蒙古在内的世界上的所有蒙古人的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员，是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共同体，是使蒙古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族群。他通过论证喀尔喀部族在蒙古民族的核心地位，证明了蒙古国的历史就是蒙古民族的历史，为建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寻找依据。

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以及沙俄和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为蒙古地区的疆域形式带来了所谓“民族国家意识觉醒”，“民族学”的涵义也在此时被赋予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内容，成为

¹ 陈岗龙：《蒙古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与民俗志写作的反思》，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第17页。

²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63页。

³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63页。



界定国家历史的有效工具，为蒙古民族国家的塑造提供了合法性。S.巴达姆哈坦对喀尔喀民族共同体确立的论证，使其成为“现代国家话语的忠实表达者”，然而他在关注精英层面的声音以外，也同样重视族群认同意识在“民间”的表述。由此可以看出，S.巴达姆哈坦用学术研究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统一了“民间”与“官方”的界限，使人们形成对“民族国家意识”毫无保留地认同，并在持续不断的积淀中引发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解放运动”。

三、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建构

蒙古国（原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较之其内部传统民族悠久的历史，是相对短暂的，各个传统民族部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依赖于国家的统一和整体社会的进步。以民族学家为代表的文化精英阶层，必须要在思想上对“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做出奠基工作。我们应看到，S.巴达姆哈坦从民族学角度对蒙古历史的研究，其着重点不在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意义，在“在解释框架的意义上立足于现代社会”，为传说中的历史找到了科学依据。他将历史事件与现代意义的阐述交织在同一话语中，从而强化了各民族部族（尤其是缺乏编年史材料的少数民族部族）的认同心理，这就是“历史性建构”对现代国家、现实民族共同体的意义。S.巴达姆哈坦像史学家一样从内部观察蒙古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轨迹，尤其结合了近现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巩固了“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和现代化进程。他为蒙古国“民族学”所做的贡献，加深了蒙古人的历史意识，而无论“民族学”还是“历史学”的编纂，都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重建。1981—1995年间，S.巴达姆哈坦负责出版了三卷本《蒙古国民族志》（第一卷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志》），2003年，蒙古国博物馆馆长A.敖其尔教授又负责编辑出版了五卷本《蒙古史》，他曾经指出：S.巴达姆哈坦对氏族和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为撰写民族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些民族学和史学著作，对蒙古国众多民族氏族起源、民族历史、民族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探讨了蒙古民族发展的内部规律问题，从而论证了蒙古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实体的历史过程。以族群为对象建构的关系是历史性的，学者们通过对族群关系的历史重构，完成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建构。

现代性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按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一个社会从前现代性质到现代性质的转变，对于传统民族的影响是最大的。”¹蒙古国的现代民族发展过程，居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是S.巴达姆哈坦非常关注的问题。蒙古地区自近代以来，大抵经历了从畜牧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发展途径，其经济形态也从分散落后的畜牧业，发展为出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商品经济。S.巴达姆哈坦用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资本主义市场进入蒙古地区的划分依据，认为传统家庭手工业在这个历史时期，逐渐蜕变为现代蒙古民族工业。S.巴达姆哈坦紧密结合社会实践，对游牧文明的传统与变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切实关注了社会主义制度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带来的巨变。

S.巴达姆哈坦毕生致力于蒙古国多民族历史与发展现状的研究，在实践经验中，他将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相结合，着重表达了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考。抛开S.巴达姆哈坦的政治立场，我们应该对他毕生所付出的学术劳动给予肯定，“政治”这一范畴难以涵盖他的学术价值，其民族学思想和治学精神，为蒙古国民族学学科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蒙古现代民族国家与蒙古民族的历史之间，铸造了割裂不断的“血缘联系”。

参考文献

一、中文专著、译著：

1. 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

¹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著：《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57页。



2. 奥登等：《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
3.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游牧文明史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樊明方：《唐努乌梁海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
8. 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民族出版社，2001年。
9.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2. 杨昌儒：《民族学纲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
13. 郑凡、刘薇琳、向跃平：《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5.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何锐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
16. 大卫·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
17. [波斯]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18.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9.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王海龙等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20. [美]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编，高丙中等译：《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
21. [蒙] Б.贡嘎达希著，俄译者 А.Б.杜比宁、А.Р.林齐奈，辽宁外语专科学校俄蒙语系译：《蒙古经济地理》，据1969年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年。
22. [苏] 伊·亚·兹拉特金著，陈大维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72年。
23. [苏] P.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据1934年版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
24. [俄] 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焄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25. [俄] 斯蒂凡·苏利万：《苏联解体后图瓦共和国的民族关系》，载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26. [苏] C.A.托卡列夫著，汤正方译：《外国民族学史》，据1978年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7. [苏] Ю.Б.勃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端译：《民族与民族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 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巴根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
29. [日] 松原正毅著，杨海英审译，赛音朝格图译：《游牧世界》，民族出版社，2002年。
30. [新]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王士录、孔建勋、李晨阳、胡华生、牛振明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1.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2. [英] 爱德华·B.泰勒著，连树声译：《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3. [英] 马凌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

二、中文期刊论文：

1. 陈岗龙：《蒙古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与民俗志写作的反思》，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
2. 高丙中：《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载于《思想战线》，2005年第1期。
3. 高丙中：《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培养扎实的民族志基本功》，《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
4.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和思路》，《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 马克继：《历史民族学与民族历史学简论》，载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6. [澳] 麦克尔·安德唐著，刘文远摘译：《图瓦历史及图瓦人》，载于《世界民族》，1985年6月。
7. [苏] X.И.拉拉丁 Г.Г.斯特拉塔诺维奇：《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载于《世界民族》，1980年第6期。
8. [苏] Ю.Б.勃列姆列伊著，汤正方译：《民族学是关于民族的科学》，《世界民族》，1980年第2期。

三、蒙古语参考文献

- S. 巴达姆哈坦：《S. 巴达姆哈坦论著集》三卷本，乌兰巴托，出版于2002年、2004年、2005年



1.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Этнографийн судалгаа хийх арга барилын тухай (1958) 《关于民族志研究的方法》
 2. С.Бадамханан. 1958 онд хийсэн хүн судлалын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ажил (1959) 《1958 年的人类学调查工作》
 3.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онгол ардын үндэсний хувцас (1959) 《蒙古民族服饰》
 4.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Алтайн урианхайчуудын хуримлах зан үйлийн тухай (1960) 《关于阿尔泰乌梁海的婚姻习俗》
 5.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 аймгийн цаатан (урианхай) ардын гарлын асуудалд (1960) 《库斯古勒省驯鹿人(乌梁海人) 族源问题》
 6.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Увсын хотон нарын галын асуудал (1960) 《乌布苏省和屯人的族源问题》
 7.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Увс аймгийн хотон нарын гарлыг овгийн үлдцээр судалсан нь (1960) 《从民族的遗留资料看乌布苏省和屯人的族源问题》
 8.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ийн дархад ястны гарал угсааны асуудалд (1961) 《库斯古勒省达尔扈特部族的族源与族属问题》
 9.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ийн цаатан ардын аж байдлын тойм (1962) 《库斯古勒省驯鹿人的生活情况概述》
 10.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онгол орны угсаатны зүйн судлалын байдлаас (1962) 《蒙古国民族志研究现状》
 11.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Дархад ястны хар дархад, илжгэн, хоролмай овгуудын гарал угсаа, түүхийн асуудал (1964) 《达尔扈特部族中 Har Darqad、Yiljigen、Qorolmoi 氏族起源和历史问题》
 12.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Дархад ардын дээл (1964, Х.Нямбуугийн хамт) 《达尔扈特部族的民间服饰》(与 Х.Нямбуу 合著)
 13.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 аймгийн Мандал нэгдлийн түүх 《库斯古勒省曼德勒公社史》
 14.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өвсгөлийн дархад ястан (1965) 《库斯古勒省的达尔扈特部族》
 15.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Халх ястны угсаатны байдал (1968-1970) 《喀尔喀部族的民族现状》
 16.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оржигин найрын дэг ёсноос (1969) 《孛儿只斤的宴会习俗》
 17.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оржигийн халх (1972) 《孛儿只斤喀尔喀》
 18.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НМАУ-ын үндэстний ба угсаатны хөгжлийн асуудал 《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和部族的发展问题》
 19. С.Бадамханан. Өнөөгийн монголын өрх гэр (1973) 《今日蒙古家庭》
 20.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Элжгийн газар усны нэр, холбогдох зарим домог (1973, Г.Лувсаны хамт) 《Yiljigen 的地名、相关传说》(与 Г.Лувсан 合著)
 21.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онгол үндэстний хувцасны түүхэн асуудалд (1974) 《蒙古民族服饰的历史问题》
 22.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онголын газар усны домог (1974, Х.Сампилдэндэвийн хамт) 《蒙古地名传说》(与 Х.Сампилдэндэв 合著)
 23.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АНХ-аас үндэстний асуудлын талаар явуулсан бодлого (1980) 《蒙古工人统一联合会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
 24.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НМАУ-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н судлалын товч тойм/1970-1980/ (1982) 《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概述 (1970-1980)》
 25.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БНМАУ-ын угсаатны хөгжлийн явц (1982)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发展进程》
 26.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Алтайн урианхай (1990-) 《阿尔泰乌梁海》
 27. С.Бадамханан. Увсын хотон ястан (1990) 《乌布苏省的和屯人》
 28.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Ойрад угсаатны угсаа-түүхийн тойм (1993-) 《卫拉特部族的族源历史概述》
 29. С.Бадамханан. Мянгад ястан угсаатны байдал (1993-) 《明阿特部族情况》
 - S.巴达姆哈坦:《蒙古国民族志》三卷本,(第一卷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志》)
- БНМАУ-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 (боть1) . У. Б. 1987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 (боть2-3) . У. Б. 1996
- “Этнографийн судлал” 《民族志研究》
 - “Угсаатан судлал” 《民族学研究》
- (以上两部为蒙古国科学院学术期刊, 主要作为查看蒙古国民族研究的学术资料。)
- Монголын угсаатны зүйн удиртгал. У. Б.1992
《蒙古民族学导论》, 乌兰巴托, 1992 年。

四、英文文献:

1. Anatoly. M. Khazanov and Andre Wink, *Nomads in the Sedentary Worl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1.
2.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1986.
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1983.



4. David Theo Goldberg, *Modernity, Race, and Morality, Cultural Critique*, No.24.(Spring, 1993), pp. 193-227.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5. Fujiko Isono, "The Mongolian Revolution of 1921",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0, No.3. (1976), pp. 375-394.
6. George G. S. Murphy: "Planning in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8, No. 2. (Feb., 1959)
7. Stephen Kotkin and Bruce A. Ellenman, *Mongol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dlocked Cosmopolitan*, New York, 1999.
8. William Ballis: "Soviet Russia's Asiatic Frontier Technique: Tana Tuva", *Pacific Affairs*, Vol. 14, No. 1. (Mar., 1941)

专有名词对照表:

Монгол хэлтэн	Mongolian group	蒙古语族
Түрэг хэлтэй угсаатан	Turkic group	突厥语族
Угсаатны судлал	Ethnology	民族学
Угсаатны зүй	Ethnography	民族志
Угсаа-нийтлэг	Ethnic community	民族共同体
Угсаатны интеграци	Ethnic integration	民族一体化
Угсаатны бүлэг	Ethnic group	族群
Угсаатан	Ethnicity	种族
Үндэстэн	Nation	民族
Хүн судлал	Anthropology	人类学
Ястан	Tribe	部落、部族
Овог	Clan	氏族
Хээрийн шинжилгээ	Fieldwork	田野调查
Явуул судалгаа	Journal study	旅行研究
Сэдэвчилсэн судалгаа	Theme selection study	特定研究
Монографи судалгаа	Monography study	专题研究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欢迎加入并转发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57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